

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之倡议与创校始末

邱克威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中文系)

摘要：南洋华侨中学从 1919 年建校至今一百年。这所中学在南洋华人教育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一座历史丰碑：一、它标志着南洋华人办学历史上打破方言帮派畛域的一杆重要旗帜；二、它标志着南洋华人基础教育学制与升阶上的完善化；三、它标志着南洋华文学校教学与管理上的质量提升以及统一化与规范化。而这些重要意义，唯有重新检阅一百多年前先贤们倡办中学的呼吁与殷望中才能真正体现出来。本文主要根据 1913 年以至 1920 年的各种报章报道资料，分析当初南洋华人“三度”倡办中学时前仆后继的努力。这三度为：第一、1913 年胡惟贤倡议并拟就中学章程；第二、1916 年章太炎南来倡议办中学；第三、1917 年陈嘉庚领衔倡议筹办中学。这数年的“三度”倡办中学运动，最后终于经由 1918 年同德书报社与国风幻境剧社在马来半岛九个城镇演剧筹款，而汇集成一股巨大凝聚力，于 1918 年成立筹办会，并由此完成“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的创建。在此期间，1917 年作为里程碑式的一个年份，来自各方的有利条件霎时汇集起来，包括中国教育与侨务上的一系列活动，为这场牵动整个南洋各地华人的办学运动画上完美的结点，各方支持汹涌而至。于是 1918 年 6 月份才成立的筹办会，在短短十个月后的 1919 年 3 月份，南洋华侨中学就已正式开学。本文通过梳理这一系列南洋华人“倡办中学运动”的历史脉络，希望由此还原这所中学真实的历史定位与意义。

关键词：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 华中校史； 华文教育； 南洋华侨

The Proposal and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KHOO Kiak Uei

(Xiamen University Malaysia)

Abstract: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in Singapore was established 100 years ago in 1919. This high school signifie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the education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First, it symbolized th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 of a collaborated effort among all different dialect groups in Southeast Asia in its education history. Second, it symbolized the perfection of the Chinese elementary education system in Southeast Asia. Third, it symbolized the overall uplifting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he teaching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sses in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chools. These significances are only apparent by looking back more than 100 years ago when the early Chinese urge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high school. This paper, with reference mainly to newspaper articles during the period of 1913 to 1919, analyzes the entire process of a ‘three attempts’ to propose for establishing a high school. These three attempts were: first in 1913 when Hu Weixian proposed for a high school and drafted a memorandum, second in 1916 when Zhang Taiyan visited Southeast Asia and proposed for a high school, third in 1917 with Tan Kah Kee as representative proposed for a high school. Collectively these three attempts managed to gather a united force and with the donation fund that Tongde Society and Guofeng Huanjing Theatre received from their performance in nine towns throughout Malay Peninsula, it finally succeed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working committee in 1918 and henc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in 1919. Within this period, 1917 was a monumental year whereby all preferable conditions consolidated, including those changing events in the education scene and overseas Chinese policies from China, that eventually gathered the necessary support in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high school. Hence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orking committee in June

1918, it took only a mere ten months in March 1919 before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officially commenced lessons. This paper, by means of a chronological description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is ‘middle school movement’ among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aims to restore the true historical role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high school.

Keywords: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Hwachong Institution history, Chinese Education,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引言

坐落于新加坡的南洋华侨中学创建于 1919 年，至今恰值 100 年。2019 年 3 月 21 日一百周年校庆日，在新加坡武吉知马校园隆重举行了“万人宴”，并由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主持开幕（黄伟曼 2019）。晚宴的同时推出《百年华中情》（寒川主编 2019），从历史纪事到回忆文章等方面记述了南洋华侨中学这一百年的校史历程，尤其《波澜起伏在山岗——华中 100 年纪要》（杨绍强 2019）、《二战前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对华侨中学的贡献》（李秉蔼 2019）、《华中倡办人陈嘉庚》（黎运栋整理 2019）等篇，对于南洋华侨中学创办的历史做了不同角度的梳理。

整体而言《百年华中情》在处理这百年历史上前轻后重，乃其编纂策略自难厚非。然而对于还原一百年前南洋华人创建这所中学之真实历程及其连带之历史定位，则《百年华中情》都不免欠缺；其中如对于 1918 年以前整个南洋华人筹办中学的历史过程，以及 1918 年成立筹办会以至 1919 年中学开学的发展大体阙如。总之，《百年华中情》的整体缺憾，关键在于无法体现这一所“与我海外侨胞之成败存亡，大有最密切最重要之关系”的中学之历史定位及其历史意义。

《百年华中情》是一部纪念南洋华侨中学一百周年校庆的校史记录，但从创校历史的梳理而言实在不如叶钟铃近三十年前的《南洋华侨中学的创设：概念的产生、演进与实现》（1992），不论是史料的掌握或是史实的洞见，当然更包括历史叙述的视野与格局；虽然叶文本身也是难免一些史实失准之处。

至于《百年华中情》，其具体史实上的错误自有不少，例如杨绍强（2019）云：

董事们在 1918 年 6 月 13 日开始，每逢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出街劝捐。

实则 1918 年 6 月 15 日才成立临时董事会，此前不可能有“董事们”；况且“每逢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出街劝捐”其实是 1919 年 6 月 2 日正式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议决，这也是林义顺接替陈嘉庚担任董事会主席所主持的第一次会议。其记录云：

添举入余来吉、蔡日升、李合兴、蔡嘉种、李玉阶、陈赞朋诸君为劝捐员，并定于每逢拜二拜五下午二点半齐到总商会，预备摩托车四辆，计谦益号、林义顺、黄有渊、吴胜鹏各一，依期毕集，同出募捐。¹

又如杨绍强（2019）云：

1918 年 6 月 8 日，陈嘉庚联合马六甲培风学校、本坡端蒙、养正、启发、爱同等一共 15 校总理，在《叻报》发布《实行筹办南洋华侨中学之通告》。15 日，陈嘉庚假中华总商

¹ 1919.6.4《南洋华侨中学校正式校董第四次会议案》。按：本文资料多源自《振南日报》，为省篇幅，凡征引《振南日报》报道，一律进行脚注并仅注明日期与报道篇名。《振南日报》所刊登具名作者的文章除外。本文所征引报章报道多重见于《叻报》，然而由于《振南日报》主编邱菽园更多亲身关注于南洋华人教育，尤其身任筹办会临时董事，且受托参与拟定“学校章程”、“校长任务规章”、“校董职务规章”，因此《振南日报》所见筹办中学与南洋教育相关报道更集中，于是本文所征引材料以《振南日报》为主。

会召开会议，参加的侨众代表 55 人，皆是各帮的领袖。陈嘉庚慷慨激昂说……。大会请黄炎培…延聘校长。各帮的领袖在 1918 年 7 月选出临时董事 54 人。

这里的错误较多。第一，1918 年 6 月 8 日的《通告》联署应为 16 人。参照 7 月 3 日公布的《南洋华侨中学筹办员总录》中的名单所列为 16 人²。其中问题是《叻报》6 月 8 日（LP0010660³）的《通告》签署人中少了应新学校总理陈梦桃，然而到了 6 月 14 日（LP0010664）以后，签署人中就开始补上“陈梦桃”了。这种情况《振南日报》也完全一致，所以绝对是供稿人自己的手民之误。因此 6 月 8 日《通告》的联署人应为 16 人。第二，6 月 15 日会议的各校总理，根据上述《南洋华侨中学筹办员总录》总数为 56 人，杨文云“55 人”是错的，而谓“侨众代表”更是不准确。第三，所谓“大会请黄炎培”并非 6 月 15 日的会议提出的，而是 7 月 6 日的第二次董事会议，记录云“公决延聘校长，……应由陈总理函托上海教育会会长黄炎培先生，审慎访聘”⁴。第四，“各帮的领袖”一句错误很严重。首先，1918 年 7 月 3 日公布的临时董事名单是于 6 月 26 日的第一次董事会议上选定的，人数为 56 人，其中选定带职务的董事 4 人；更重要的是这些都是“各校总理”，而非“各帮的领袖”。其次，所谓“各帮的领袖”及其人数分配，则是在 1919 年 2 月 18 日第五次董事会议上“提议取消临时董事，改选正式校董之规定”中议决的⁵，且于 4 月 4 日选出正式校董 60 人⁶。再次，正式校董选出“各帮的领袖”名额为“三江四名、琼州二名、福建十三名、广府五名、潮州九名、大埔一名、嘉应二名”，一共是 36 人，这与当初议决的人数分配是一致的；然后再加上“各校总理二十四名”，所以正式校董总人数“统计六十名”⁷。

除了杨绍强（2019），其余篇章中也有错处，比如：

陈嘉庚倡办的华侨中学，是全南洋第一所华文中学，以后南洋各地才有雨后春笋般的华文中学的出现，他的大胆开拓精神，堪为时代先驱。（黎运栋整理 2019）

因此，成立一所南洋华侨的最高学府，便成为新加坡华侨多年的夙愿。（李秉藻 2019）

当中所谓“全南洋第一所华文中学”、“新加坡华侨多年的夙愿”等都有失准确。

首先关于“全南洋第一所华文中学”（黎运栋整理 2019）。实则陈嘉庚在南洋华侨中学开学典礼的致辞就提到“檳城亦办中学”⁸。这是指先于新加坡的南洋华侨中学一星期开学的檳城华侨中学⁹。1918 年 5 月份当新加坡同德书报社召集筹办中学的同时，檳城平章会馆也接获刚升任不久的檳榔嶼领事官戴淑原召集筹办中学，其通告云：“本会馆接奉戴领事函嘱召集会议，倡办中学，事关系本埠教育前途甚大，兹订本月廿四日下午三点钟，在本会馆开议。”¹⁰可见其正式会议早于新加坡，更且率先于 1919 年 3 月 15 日开学，“计学生到者三十五人，报名未到者尚有六

² 这份《通告》由 16 位学校总理联署，叶钟玲（1992）早已讲过，若《百年华中情》（寒川主编 2019）在编写时进行过参考，应该就不会犯错。

³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所扫描《叻报》，每份均标上序列刊号，本文凡引《叻报》，除注明日期，也同时标示刊号。

⁴ 1918.7.9《南洋华侨中学第二次董事会议案》。

⁵ 1919.2.19《南洋华侨中学第五次议案》。

⁶ 1919.4.9《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初选正式校董总录》。

⁷ 1919.4.9《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初选正式校董总录》。

⁸ 1919.3.26《南洋华侨中学开校纪事（续）》。

⁹ 关于檳城华侨中学的创建以及戴淑原在檳城华文教育史上的贡献，已经有许多人进行过研究；专门研究者有叶钟玲（1993）《檳城华侨中学校史》，至于研究戴淑原而涉及檳城华侨中学者如黄贤强（2007）《客家领袖与檳城的社会文化》、李叔飞（2013）《民国领事戴淑原与檳城华人社会》。但却都未明确指出檳城华侨中学开学的具体日期，比如黄贤强（2007）的论述最具代表性，其云：“虽然有关檳城华侨中学正式上课时间及中学的管理运作的情形尚需进一步挖掘资料厘清，但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它是檳城所成立的第一所华文中学。”

¹⁰ 1918.5.4《星檳同时各筹中校》。

人，教员职员约三十人”¹¹。其首任校长许克诚¹²，曾与南洋华侨中学首任校长涂开舆初抵新加坡数日后之1919年2月11日联合举行教育研究演讲会¹³。

实则印尼爪哇地区华人早在1910年就已向当时清政府请款办中学，但却延至1911年6月才正式开学。这一点叶钟铃（1992）文章就已提及。此外，上述槟城戴淑原在1914年曾与视学官熊长卿联署呈请中国教育部兴办中学，其公函中就提及：“荷属爪哇中学，粤省前有岁助二千元之举。”（槟城新报1914b）又熊长卿1917年一篇谈“侨学”的文章也说：“七年以前，祖国对于侨学，颇事奖进。视学员常驻此间，宣慰使随处劝导。……拨款二万两，为爪哇中学开办费，岁复由闽粤江南三关，拨款二千，以为常费。”（熊长卿1917）

无论如何，南洋华侨中学都不是“全南洋第一所华文中学”。

其次是关于“新加坡华侨多年的夙愿”（李秉嵩2019）。实则从倡议策划至集资招生，筹办中学是整个南洋华侨的长久殷望，且如1918年6月8日发布的《实行筹办南洋华侨中学之通告》所云“南洋华侨中学，不容不办，不容不亟办，而尤不容不合办”，其后筹办会上陈嘉庚就任临时董事主席的演说也重申：“故南洋中学，尤不容不合办也。”¹⁴此外《通告》还提到“夫南洋之应设华侨中学也，已十年于兹矣”。可见南洋华侨的中学须由全体合办，是长久来的共识。尤其1918年筹办会的契机正是国风幻境剧社遍历马来半岛九个城镇演剧筹款所得一万七千元的银款，计为：“麻坡、马六甲、吉隆坡、巴生、金保、安顺、怡保、太平、槟城”¹⁵；而嗣后1918年8月起的“致各埠华校招生统表”，其生源范围同是涵盖新马印各地，乃至包括缅甸仰光。

至于建校地点择定新加坡，这是1918年临时董事会的议决结果；当然主要是新加坡本身的客观优势条件。即如上述《通告》所总结：“星洲一埠，为南洋群岛之总汇，各埠学校林立，学风趋向，俱视此地为转移”；再以1917年11月9日公布的《侨学成立之校数》所列数据比较，新加坡共14所学校，学生总数1756人，占据新马各埠之冠，槟城与霹雳紧随其后，学生总数分别为874人与782人，均不及其半。因此南洋华侨倡办中学，校址择定新加坡自是顺理成章；甚至1917年厦门暨南总局曾提议助南洋华侨办中学，亦言及“移助新加坡，创办华侨中学”¹⁶，又同年中国北洋政府教育部更将“新加坡中学”列入当年的年度预算中¹⁷。于是第一次筹办会讨论后的表决结果即称“表决中学校地点，指定新加坡”，且“表决定名曰，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¹⁸。

总之，南洋华侨中学之校址择定新加坡，这是最初筹办会权衡一切条件之后的议决结果¹⁹，即筹办会成立会议议程的第一点就是：“讨论中学校地点是否以新加坡为适中”²⁰。

由是正确把握南洋华侨中学对于整个南洋华人社会乃至华文教育发展的非凡意义，需得通盘系统而细致地梳理南洋华人倡办中学的整个历史过程，包括当时的所有客观环境与条件；否则将无从理解如1918年6月8日发布《实行筹办南洋华侨中学之通告》之所云：“凡我英荷各埠闽粤诸同胞，须知南洋华侨中学，与我海外侨胞之成败存亡，大有最密切最重要之关系。”

值今办校100周年，《百年华情》（寒川主编2019）于此等关节难免缺憾，尤其1918年成立筹办会以前南洋华人各界“十年于兹”的呼吁和努力近乎阙如，以及同时期其他关键人物的努

¹¹ 1919.3.21《中学校开幕》。

¹² 根据《振南日报》1919.2.13《教育研究纪要》所记载，校长名字为“许克诚”。然而黄贤强（2007）却记录校长为“林克诚”，据其文章所引《槟城新报》1919年2月14日之报道只云：“教育部派充槟城中学校长教员两人，已偕黄君炎培，于本日假道怡保乘火车到槟。”（槟城新报1919）却并未提及姓名，黄文应另有所据。

¹³ 1919.2.13《教育研究纪要》。

¹⁴ 1918.6.19《筹办南洋华侨中学大会议之情形（续）》。

¹⁵ 1918.5.3《侨胞筹办本坡中学》。

¹⁶ 1917.6.1《又有裁撤福建暨南总局之消息》。

¹⁷ 1917.9.5《勉哉南洋教育家》。

¹⁸ 1918.6.22《筹办南洋华侨中学大会议之情形（四续）》。

¹⁹ 历史不能假设，我们也未见到当时完整的会议记录。但当时槟城也在筹办中学，这一消息新加坡中学筹办会诸人是非常清楚的。我们试一设想，当时若是槟城未筹办中学，南洋华侨中学校址的议决是否会不同结果。

²⁰ 1918.6.12《筹办南洋华侨中学特别大会传单》。

力与贡献，包括其后一系列发展乃至汇成 1918 年筹办会的历史脉络，亦付之阙如。实则 1918 年陈嘉庚就任筹办会临时主席的第一次会议演说就提及：

回忆数年前，鄙人曾具意见书倡办中学，无有应之者。嗣复有人提倡此举，鄙人又首先签名赞成，乃竟徒托空言。不久即无声无臭，心灰意冰，亦只空唤奈何耳。²¹

即此已简要概括了南洋华人倡办中学，一路走到 1918 年成立筹办会经历了多重的曲折起伏；其中展现出南洋华人维持与发展华文教育的坚毅精神，更集中体现出一所南洋华侨中学对于当时华人的重要意义。

一、1918 年前之倡办南洋华侨中学及其环境条件

上文提及南洋华人在 1918 年成立中学筹办会之前经历了“十年于兹”的呼吁和努力，叶钟铃（1992）在分析南洋华人倡办中学“概念的产生、演进与实现”，分为七波“前仆后继地推动”，即：一、1912 年刘士木与白荜洲合著《筹划南洋华侨教育草案》；二、1913 年南洋英属华侨学务总会发表《南洋英属华侨学务总会规划学务草案》；三、1914 年总领事胡惟贤巡视马来亚时的宣传与呈文中国教育部；四、1916 年章太炎在槟城与吉隆坡等地演讲倡议设立华侨中学；五、1917 年福建省议员数人倡议设南洋福建华侨中学；六、1917 年谢碧田任吉隆坡华侨代表呈请总统在新加坡设立中学；七、1913 年与 1917 年陈嘉庚等人几次倡议设立中学。²²

叶钟铃（1992）所整理的不可谓不细，然而作为历史脉络的叙述略嫌割裂²³；尤其所列举的七波倡议有的难说是推动，如 1917 年福建省议员倡议的一波，更具体说反而是遭到南洋华人的普遍反对。原因就在于以撤掉厦门暨南总局的代价太大，更何况其年费补贴一万元，论者直谓之“星坡办学不患无费，何必计此区区”²⁴。再如其云 1913 年《南洋英属华侨学务总会规划学务草案》有些不准确的地方：首先，该草案刊登于《叻报》1912 年 12 月 5-7 日，并非 1913 年²⁵，而其中“筹设普通中学及商业学校”一则乃见于 12 月 6 日（LP009207）；其次，学务总会于 1912 年 8 月始设立筹办处于总领事馆，初名“南洋英属中华学务总会”，“华侨学务总会”之名乃 1913 年才改的，上述草案仍以“中华学务总会”名义刊布。又如其云 1914 年胡惟贤的宣传活动似乎不应与学务总会割裂来谈。首先，学务总会 1912 年筹办，但却迟至 1914 年 2 月 23 日才宣告成立，其拖延的主因乃“当选者不愿就职”，而即使 1914 年成立后之第一年内仍因人事纠纷“以故一事未举”²⁶；其次，1912 年“胡惟贤初抵驻领任，即自拟中校章程，条列华英文多节，印刷几千张，意欲大办”²⁷，而且从胡惟贤在总领事任上的工作，上述《草案》或与时人所称其“自拟中校章程”相关，又或者至少应看作是胡惟贤学务工作的其中环节。此外 1912 年的这份“草案”后来经扩充并定案为 1915 年 3 月份《振南日报》所连载之《学务总会意见书》。又再如 1916 年章

²¹ 1918. 6. 18《筹办南洋华侨中学大会议之情形》。

²² 1922 年涂开舆校长首次整理的南洋华侨中学校史分为两大时期，即“创办时期”、“实施教学时期”，云：“自光绪三十一年提倡创办起，至民国八年三月廿一日本校开学日止。”其中以“光绪三十一年”谈起，其实是指清末南京暨南学校开办而鼓励南洋华人子弟升学为南洋华人倡办中学的起始点。（南洋华侨中学 1922：34-36）。

²³ 叶钟铃（1992）文中似乎是将其所掌握的关于新马华人倡办南洋华侨中学的资料悉数全面列举。然而其中却漏了槟城总领事戴淑原的倡议活动。戴淑原有几次重大的倡办中学活动，较重要的是两次：一、1914 年与熊长卿联署呈请中国教育部设立中学（槟城新报 1914b），与胡惟贤同时；二、1918 年去函平章会馆促其兴办中学，这一次直接成功于 1919 年办起槟城的第一所中学——槟城华侨中学（叶钟铃 1993）。

²⁴ 1917. 9. 6《暨南局之救星》。

²⁵ 叶文指《南洋英属华侨学务总会规划学务草案》见于 1913 年 12 月 5 日《叻报》，其实应是 1912 年。

²⁶ 1915. 3. 4《学务总会意见书》。

²⁷ 1916. 12. 20《中学堂新旧帐》。

太炎南来演讲，10月2日在新加坡南顺会馆演说具体谈及“非筹设中学不可”²⁸，叶文却未言及于此。²⁹

无论如何，叶钟铃（1992）文中指出这是一场“前仆后继地推动”的办中学运动，这是很准确的定位；即这是整个南洋华人长久的夙愿，而经过前后多人多年的前仆后继，让这一星华文教育的火种持续燃烧，终于在1918年当一切客观条件都成熟时即刻引爆。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明白1918年6月才成立筹办会，竟在短短十个月后的1919年3月21日就正式开学。

实际上若根据当时人的总结，包含1917年4月份正开展着的一次，南洋华人之“倡办中学校，于今三度矣”（少界1917）；即是指南洋华人社会中“三度”公开号召且具备动员力的倡议筹办中学。而历数目前资料上所见，这“三度”是指分属从1913年至1917年的三次公开倡导兴办中学运动；其分由不同个人所倡导，然而始终贯穿其事的一个关键人物则当属陈嘉庚；此外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胡惟贤虽未直接参与最后阶段的工作，但其前期的铺垫与筹划，乃至兴办学务总会的整体效应，包括提高社会认识、整合社会意见，确实其功不可没。

陈嘉庚在1918年成立筹办会上的讲话，称其多年倡议无果，“心灰意冰，亦只空唤奈何耳”的心情，估计是当时关心南洋华人子弟教育未来的同仁们所共同经历的。包括1916年时人追述三年前初抵新加坡的总领事胡惟贤多方宣导办中学，且自拟定中学章程，亦谓之：“后来自己遍历各埠仔返时，遂将印峻之章程搁起，放入故纸堆中。”失望之余难免揪心，因此中华总商会理事蓝伟烈（1917）在历数多次的倡办中学未果之后乃疾呼：“今年不能开办，明年亦然，年复一年，中学必无成立之期矣。”

然而视乎当初南洋华人办中学的客观条件，某些人的迟疑与观望也并非无因。总结各方意见，包含经费、生源、师资；而1918年6月8日发布的《实行筹办南洋华侨中学之通告》上则归纳为“有二原因在焉”：“其一则以巨大之经费难筹也”；“其一则以及格之生徒难集也”。实则我们分析当时整体形式，似应还有一层内因。即当时社会方言帮群各自畛域分明，而小学亦分属各帮掌管，而欲设一机构凌驾所有小学之上，且对其教学内容、教学质量多所牵制，难免会受到冷遇。于是我们能明白中学临时董事会1919年2月讨论成立正式校董的名单时，最后议决是“本坡男女各校之正总理若干名”，另外则是“由各帮再行补举计闽帮十三名、广帮五名、潮帮九名、客帮三名、琼帮二名，闽粤之外另有各省侨胞应选四名，合计五十多名，为正式校董，任期一年。”³⁰这也正是上述《通告》开宗明义就指出南洋华侨中学“尤不容不合办”的道理。因此这个包含各方方言帮群以及各帮所属小学的董事名单，极具针对性地妥善处理了帮群分立的障碍，确保了南洋华侨中学成立初期的顺利发展。³¹

当然，历经多次多人倡议未果，但合力办学的认知已颇成共识，然而分析1918年契机的一个关键客观因素，就是根据1917年的各方意见当年高等小学毕业生人数已达到一定积累。这在当时已有很多人提出来。举例如叶钟铃（1992）指出1917年养正学校校长熊向父“曾往英属各地进行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迄1917年止，新马二地有近百名小学毕业生，具备报读中学的资格”。再如黄炎培1917年南来考察华人教育也肯定注意及此，于是回国后积极复办南京暨南学校，并在

²⁸ 1916.10.6《章先生演说词录（再续）》。

²⁹ 《振南日报》1916年10月3-6日连载章太炎在新加坡南顺会馆的演说词。其中记录的演说词与叶文所引为檳城的一次演讲完全一致。只是叶文并未提及檳城演说的具体时间提点，也未提供资料依据。

³⁰ 1919.2.19.《南洋华侨中学第五次议案》。

³¹ 叶钟铃（1992）文末总结南洋华人屡次倡办中学失败的原因，云：“在陈嘉庚号召各帮首领创办华侨中学以前，南洋英属学务总会曾发表筹设中学及业学校的意见，广帮领袖简英甫亦曾推动创小学，由于缺乏责任心和团结心，以致一筹莫展。只有在解决两个难题：巨大经费之难筹，及格学生之难集，海外华人在南洋设立一所华侨中学的愿望，才告开花结果。”这与本文所分析的原因相一致，即：一、方言帮群不合作；二、经费维持有困难；三、符合素质要求的学生人数不够。当然我们还看到的是，社会各界对于合力办学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认识水平，在屡次倡议失败经验中逐渐积累起来，同时也提升了对于学制与课程统一标准化、强调教育与教学质量的认识水平，也是1918年能成功组成筹办会进而办起南洋华侨中学的重要因素。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一再重申学务总会的功不可没。

1918 年 3 月份就正式开学；同时他还极力主张：“今后政府必重视华侨教育。”（黄炎培 1917[2015]）

整体而言，由陈嘉庚所领导的筹办会、临时校董以至于初期的正式校董深谋远虑，对于当时整体形势的判断都具超凡的卓识。除了上述董事名单，又如当时多数人于经费一节多盲目乐观，举例 1917 年时人论及筹办中学经费一节云：“新加坡为南洋总枢纽，华侨百余万，热心公益者亦实繁有徒。光复时因闽省经费之支绌，筹备补助，一呼立应，不旋踵而汇归祖国者数十万，岂因一中学而少此区区之一万金乎。”³² 况且筹办会成立之初短短数天的各方捐资就达数万，只是陈嘉庚却始终保持态度审慎，并语重心长谓：

现虽属有五万元，然以之供开办费，并两年维持费斯可耳，若更谋伟大之建筑，则必购数英亩之地，营宿舍讲堂数十座，容生徒数百人或近千人，核其经费，当在二十万元以上。似此区区，以内外各埠侨胞之踊跃捐输，实不难咄嗟之办。倘误视中学经已成立，便可谢却仔肩，则误矣。³³

总之，南洋华侨中学的创建是南洋华人“十年于兹”的努力，更经过“三度”前仆后继地克服障碍，以其集思广益与精心策划而最终得以具体落实的成果。

（一）南洋华人三度倡办中学

关于南洋华人“三度”倡办中学，除了上文所引 1917 年文章所称，1916 年章太炎南来倡议办中学，《振南日报》即有报道称：

章太炎希望政府以数十万元来办中学，而抑知政府无此财力，徒托空想，欲求慰愿，不知何日。且中学之议，非太炎到叻，始能言之也。三年前胡惟贤初抵驻领任，即自拟中校章程，条列华英文多节，印刷几千张，意欲大办。后来自己遍历各埠仔返时，遂将印竣之章程搁起，放入故纸堆中，必有由矣。太炎拾胡领之唾余，以为席珍，今尚有拾太炎之唾余者，与其自挖肠肚，绞脑筋，不如向领属字纸簏中，寻些旧时印刷品，照录翻版之尤易耳。³⁴

于是很显然，1917 年时社会认定曾形成舆论且受关注的“三度”倡办中学，即：第一度，1913 年胡惟贤之倡议且自拟章程；第二度，1916 年章太炎之演讲宣导兴办中学；第三度，1917 年陈嘉庚为代表倡办中学。

第一度即 1913 年开始，由胡惟贤倡议并展开广泛宣传。无独有偶，此时陈嘉庚也已同样提出了办中学的建议；如杨绍强（2019）称：“1913 年 5 月，华中的倡办人陈嘉庚在家乡集美给石叻坡的中华总商会写了一封信，吁请商会建议组织一所中学。”并引述总商会 6 月 7 日议决：“唯本坡已有华侨学务总会。此项中学校自属学会范围。应行函复陈君，请其亲向学会情愿可也。”杨文其后则云：

研究陈嘉庚和华中历史的学者专家至今没有找到任何的证据显示陈嘉庚得到中华总商会回复之后，曾向华侨学务总会情愿。这意味着当时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响。

然而如上文所述，1913 年 6 月份南洋英属华侨学务总会仍处于筹办阶段，其筹办处自 1912 年 8 月份就设于驻新加坡总领事馆，因此极其显然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1913 年将办中学一事推向学务总会，其实就是婉拒其事；更何况学务总会由筹办到成立之初人事纠纷，乃至“开幕之后，总理易人，辗转需时，以故一事未举”³⁵。

³² 1917. 11. 1《暨南局万岁（三续）》。

³³ 1918. 6. 22《筹办南洋华侨中学大会议之情形（四续）》。

³⁴ 1916. 12. 20《中学堂新旧帐》。

³⁵ 1915. 3. 4《学务总会意见书》。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当时的态度，亦可据时任商会理事之蓝伟烈数年后的一番剖白略得佐证，其云：“董同侨诸公孜孜营业，惟日不给，明知设立中学校为现在要着，甘捐出巨资以为开办，而以无有余暇可为董理之人。至稍观望，以为之俟，如鄙人者，亦又如是。”（蓝伟烈 1917）

因此陈嘉庚肯定也是心里明白，于是他后来追溯这段历史时仅仅含糊此事地说：“回忆数年前，鄙人曾具意见书倡办中学，无有应之者。”³⁶所以他此后并未转向学务总会去信，实在是情理之中。

当然，所谓“南洋英属华侨学务总会”，其最初筹办处设于胡惟贤的驻新加坡总领事馆，而且胡惟贤本人就是学务总会的首倡者。因此中华总商会或者知道胡惟贤正在倡办中学，所以转推荐给胡惟贤。不论如何，其婉拒推拖的态度应是显而易见的。实则更关键是陈嘉庚之建言与胡惟贤之倡议是否有关联。首先，胡惟贤对于办学很有经验，自称：“惟贤前曾在上海办学，嗣服官江西，历任五县，无不以办小学中学为急务。”（胡惟贤 1914c）而其初抵南洋就曾“拟于新加坡华侨公学一所，课务仿上海南洋公学”（胡惟贤 1914b），因此这一份印制分发的“中校章程”，对他来说本就是上海办学务的照本复制而已。其次，他就任总领事对于南洋学务尤为关注，如其 1914 年 7 月份的自述云：“自领新加坡，经年又半，细察侨务，今日亟宜注重者，提倡学务。”当然，自 1914 年初中国教育部颁布《领事经理华侨学务规章》规定当时华侨教育事务统归领事管理（檳城新报 1914a），“提倡学务”自当是分内之职，但胡惟贤自上任时就关注南洋学务，到 1914 年 7 月就已“经年又半”，显然其关心学务更在上述规章颁布之前。再次，胡惟贤 1912 年 9 月受任驻新加坡总领事，其拟就章程并印制分发，进行宣传，或许可能是在陈嘉庚去函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之后，但却不太可能是陈嘉庚之建议的影响；反而是不排除陈嘉庚在总商会冷遇后复听说胡惟贤倡办中学，而主动签署支持，即其所云“嗣复有人提倡此举，鄙人又首先签名赞成”。更何况至晚在 1916 年，陈嘉庚就曾担任学务总会的理事³⁷。

当然陈嘉庚签署后的结果是“乃竟徒托空言”，即正与胡惟贤倡议运动的结果相一致，即时人云：“遍历各埠仔返时，遂将印峻之章程搁起，放入故纸堆中。”³⁸

胡惟贤在 1913 年的这一次倡议活动遇到的挫折确实不小。但综观这期间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措施却都没有白费，甚至是持续发挥着效应，一定程度上汇集起了民意，最后则在 1918 年的中学筹办会工作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包括组建学务总会并展开一系列学校与学生的调查，如 1915 年 8 月份公布的“华侨学校学生”总数、“华人在英文学校肄业之人数”³⁹；此外还有 1914 年提呈中国教育部倡议兴办南洋中学，并附录其意见书与章程（参看胡惟贤 1914b）。

首先，我们看他“历遍各埠”的倡办中学宣传活动，目前所见记录只有 1914 年 9 月 1 日在吉隆坡商会的演讲，他提出三项“愿与商会商榷者”，其三就言及“故小学为当务之急，而中学益不可视为缓图”，且云：

惟贤尚拟明年在新加坡创设华侨公学一所，专收各埠小学毕业之学生，分中西文教授，数年毕业，俾直接入北京大学，与英京及香港大学。成否不可知。今刊布意见书及简章，如荷赞成，不难成立。（胡惟贤 1914c）

其“意见书及简章”，应反映于 1915 年 3 月份刊布《学务总会意见书》中所单列之“中学校”一节，云：

³⁶ 1918. 6. 18《筹办南洋华侨中学大会议之情形》。

³⁷ 1916. 6. 3《学务总会大会纪闻》。

³⁸ 1916. 12. 20《中学堂新旧帐》。

³⁹ 1915. 8. 5《学务总会报告册》；1915. 9. 2-30《学务总会调查华人在英文学校肄业之人数》。

兹拟调查本年高等小学毕业人数，如在三十名以上，则从速与各校总董筹商开设中学校，俾毕业者得有升学之地；如不及三十名，则按照部章，设补习科，以为此等毕业学生欲升入他校者，补修学科，兼为职业上之预备。⁴⁰

此外，胡惟贤还更早在1914年7月1日上呈中国教育部一份建议书，其云：“拟于新加坡华侨公学一所，课务仿上海南洋公学，中西并重。”（胡惟贤 1914b）无独有偶，与此同时的槟城领事戴淑原与视学官熊长卿也联署呈文中国教育部倡办中学，其云：

槟榔屿实华人萃聚之区，高初两等小学，几已无埠无之。惟无中学可升，故中途多失学，或转入西文学校。委员长卿，奉粤民政长令前来调查学务，与领事培元晤商，均以速为本埠设立中学为宜。（槟城新报 1914b）

槟城的这份建议书直接提出“设立中学”，且其直呼“中学以上之教育，尤为海外华侨当今急务”，殷切之情溢于言表，更何况还建议具体实施办法，包括书籍筹办、经费补助。这一份呈文较之胡惟贤，明显更为分量十足；毕竟胡惟贤虽也提“拟于新加坡华侨公学一所”，但其所云“今日亟宜注重者，提倡学务”，其实仍主要是侧重于统一管理。

至于胡惟贤的倡议运动最终“遂将印峻之章程搁起，放入故纸堆中”，大约应在1915年底，而其中“必有由矣”的原因乃与学务总会有关。看他1914年7月份提呈中国教育部的函件中说初成立的学务总会“人各一心，事各一见，主其事者，又难得深通中西教育之人”，更且“现有各级见广一隅，统一匪易，非特别提倡，不能耳目一新”（胡惟贤 1914b）。可见此时他对南洋华侨学务已颇失望，乃希望中国教育部能有作为，能“特别提倡”以“耳目一新”。尤其学务总会1914年2月正式成立不久就面临“总理易人，辗转需时，以故一事未举”，直至当年12月才开始稳定⁴¹；此后即使1915年3月份公布的《学务总会意见书》中仍包含兴办中学的提议，但社会各界始终未见任何动作，且学务并不见能统一团结。所以总结起来，胡惟贤1913年起的倡办中学活动，历经1914年为止的各地宣传，乃至成立学务总会，这一切的成效都不佳，南洋社会对此并不积极；这已足以使其心灰意冷。

然而细究其直接触发点，则还是1915年的学务总会人事风波及其后续引发的胡惟贤与学校之间的争论。事缘于1915年养正学校学生演剧筹款，而胡惟贤则发文批评此举影响学生学习且所演剧目意识不良；本是抒发己见或则无伤大雅。但最终引发为一个多月的几番公开往来辩论，且多处涉及个人，更甚者于当年12月竟由中国教育部总长张一麟出具飭令文以示发落。究其症结，即在于连同胡惟贤发起学务总会的宋木林，在1914年学务总会正式成立不久就与胡惟贤闹翻，而宋木林正是养正学校的校长。

整体而言，报章学校各界多站在养正学校一方，因此连日连番刊登反驳胡惟贤的文章，且涉及个人攻击；尤其宋木林回应中云：“若胡领事之对于侨界学务之态度，别界之人，多未深悉，容日有暇，另行举出。知我罪我，是在读者。”（宋木林 1915）这番话暗指胡惟贤对南洋侨学界的评价不佳，企图给胡惟贤的学务工作树敌；更何况还获得普遍响应，即有论者称“胡领事揭监视侨学招牌”云云（姚绍璜 1915），意极嘲讽。至于12月份中国教育部飭文，则是因胡惟贤的上报而下发，其完全维护胡惟贤，且指责“此次养正学校校长宋森”的做法“均觉不合”，“自不得沿为惯例，致启弊端”；这引起了诸多不满，如《振南日报》刊登节录飭文前的一番评论经已充斥着忿忿不平，且在上引“养正学校校长宋森”后加上按语云：“按以校董之事，而诿诸校长，奇极。”⁴²此言已摆明指责胡惟贤是专门针对于宋木林而寻衅诬告。

这一风波事态不小，至少极大打击了胡惟贤倡办中学的积极性。只是胡惟贤绝非因此就完全放弃，说其“放入故纸堆中”只是相对而言；我们可以较肯定章太炎1916年南来演讲提及“非筹

⁴⁰ 1915. 3. 16《学务总会意见书（六续）》。

⁴¹ 1915. 3. 4《学务总会意见书》。

⁴² 1915. 12. 13《教育部发飭学务总会纪略》。

设中学不可”，多少是受到胡惟贤的影响。关于胡惟贤及学务总会的各种工作及其作用，我们将在下文再作讨论。

南洋华人第二度公开且受到关注的倡办中学，是1916年章太炎南来演讲所引发。关于章太炎1916年南来在马来亚的几场演说会，许德发（2015）曾做过非常详尽的分析与阐述，如其10月17日在吉隆坡中国青年益赛会上的演说中云：“故今日欲改良教育，非从小学入手，一律以国语教授不可；欲造成共和国民资格，非从速筹办中学不可也。”这一点在其10月2日新加坡南顺会馆的演说中就已提出：“今欲高大生徒之志趣，非筹设中学不可。”⁴³ 根据上文引述，章太炎还曾建议中国政府拨款“以数十万元来叻办中学”。当然从1913年以来胡惟贤与陈嘉庚的经历所见，当时兴办中学的呼声颇受冷遇；即如章太炎及其追随者的建言也受到《振南日报》的嘲讽。然而却并非没有其正面影响的，比如1917年陈嘉庚为代表倡议之第三度办中学运动期间，前述之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理事蓝伟烈即登报“敬告侨胞”，其云：“前次章太炎先生南来，所至殷殷以此为言，鄙人缘是亟欲本素志，跃起而为，以慰章先生之厚望。”（蓝伟烈1917）

1916年的这次第二度倡办中学，其时面对着1915年学务总会推动兴办中学尚受冷遇的前车之鉴，相隔不到一年的章太炎南来何以会如此积极倡议办中学，乃至招来《振南日报》讥讽为“拾胡领之唾余”。这当然也从某个侧面揭示章太炎未必对南洋华侨学务有深切认识，即其关于南洋华人教育一节云：“近知华侨所设小学已达百余所，毕业亦颇有人，但小学知识究属有限，今欲高大生徒之志趣，非筹设中学不可。”⁴⁴ 以下完全仅就中学之课程内容一节展开讨论，而未及于当时南洋华侨教育之其他，包括办中学的难度，以及当下小学学制与管理上之诸端。而其所谓“近知”则或为此番南来才得知。无论如何，章太炎南来演讲之独钟于“筹设中学”一节，多少应受到槟城与新加坡当时之呼吁筹办中学所影响，尤其两地时任领事之戴淑原与胡惟贤正是个中主要推手；尤其胡惟贤在欢迎章太炎的致辞中就提到他与章太炎之间谈话，内容涉及“侨界之状况、侨业之情形、侨学之程度”等等（胡惟贤1916）。

尤其值得注意者，章太炎南来几番谈及“非筹设中学不可”似都与其提倡国学相关。比如叶钟铃（1992）所引述章太炎在吉隆坡中国青年益赛会的演讲，实则带有浓厚的“国学”意味，其云：

吾向闻南洋华侨子弟，偏重西文，多有不识祖国为何名，本身为某省某县人者，此非其子弟之过，实为父兄者不讲国民教育之过，惟设立中学，则有地理历史之科目，使知其身与祖国有密切关系，自能感发其爱国心，而养成其国民之资格也。（转引自叶钟铃1992）

这一段话似乎针对于当时英文学校“偏重西文”之教育而提倡“设立中学”。更何况，说中学“则有地理历史之科目”，但目前所见当时华文小学课程内本就有地理历史之科目，而且对于中国地理与历史教学之程度匪浅，举1914年端蒙学校高等小学毕业考试的地理与历史二科试题为例，地理试题如“我国沿海诸省，通商口岸凡有几处？外国租借地又有几处？”、“长城、运河均为我国最大工程，起迄何处？经行何省？世界工程之足以比拟者，又有何工程？”⁴⁵ 而历史试题则如“杜太后临崩，语太祖以何辞？试详述之。”、“仁宗问置相于王素，其后相继为相者为谁？试详言之。”⁴⁶

其实章太炎于新加坡南顺会馆提倡之“非筹设中学不可”，其理由也与这里说的“则有地理历史之科目，使知其身与祖国有密切关系”如出一辙。其云：

⁴³ 1916.10.6《章先生演说词录（再续）》。按：叶钟铃（1992）文中称章太炎“在游历槟城、吉隆坡期间”公开演讲，据其引述“非筹设中学不可”的一段演讲内容，实则与《振南日报》所载新加坡南顺会馆完全一致。然而叶文中关于这一段演讲，却未指明具体是槟城或吉隆坡的哪一个地点。

⁴⁴ 1916.10.6《章先生演说词录（再续）》。

⁴⁵ 1914.8.14《端蒙学校第三次毕业考试题目》。

⁴⁶ 1914.8.19《端蒙学校第三次高等生毕业考试问题（续）》。

所有课程，可就教育部规定者，斟酌地方情形，略微变通办法，而于本国历史，本国地理及普通法学，尤宜注重。……海外办学，并宜使生徒知国内情形，故中国地势物产风俗人情，与夫历代之治乱兴亡，及圣贤豪杰各事业，均宜深晓。……诸君子筹设中学，俾底于成，则为福南洋子弟，当匪浅甚。⁴⁷

非常显然章太炎之谈南洋华人办中学的理由，与胡惟贤、戴淑原、陈嘉庚等人都不甚一致，却与其提倡之“国学”相关。这个“国学”课题，其实也是包括胡惟贤在内的许多人对于南洋学务之所极为关心者，且并以“中学”称之，而与“西学”相对；如胡惟贤（1914a）于学务总会开幕辞中云：“中学之造诣，既邃且密；西学之程度，既高且深。”

当然，此中并不排除南洋华人之倡办中学始终都是与对抗“西学”有所牵连的。比如学务总会 1915 年 8 月份公布在新加坡华文学校“华侨学校学生”总数为 1955 人⁴⁸，而同年 9 月 2 日至 30 日统计公布的“华人在英文学校肄业之人数”总数则为 5293 人⁴⁹。而且报告的统计仅限于 15 所政府学校和教会学校，并云：“其余英文私立学校，不下十余所，所收中国学生甚多。”⁵⁰ 因此维持华人子弟中华文化教育之“中学”确实也是当时倡办华文中等学校的其中一种呼声，同时当时人确实也主张未设华文中学正是华人学生在英文学校人数众多的一个原因；但从当时整体讨论来看，这绝非重要因素，更何况倡办中学者，包括胡惟贤本人也都十分强调“中西并重”。

上述少界（1917）文中所提及的“三度”倡办中学，其第三度实则是紧接着章太炎演讲后的余波而起；也即是上引《振南日报》讥之为“太炎拾胡颌之唾余，以为席珍，今尚有拾太炎之唾余者”。根据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理事蓝伟烈 1917 年 4 月份之所述：

前次章太炎先生南来，所至殷殷以此为言，鄙人缘是亟欲本素志，跃起而为，以慰章先生之厚望。然虑斯事体大，恐非孤掌所能鸣，不得不先自游说始。何幸途日陈君嘉庚、简君英甫，亦因此事急欲出而提倡，而坡中负人望诸公，亦各有此心，缘是觉时机已至，弗可再延。（蓝伟烈 1917）

可见 1917 年的一次倡办运动是接续章太炎的演讲所引发的，而且是当时社会颇具声望的富商们所倡议；由于这次多人联合倡议乃至其后续之 1918 年的筹办会成立，陈嘉庚都是其中最关键的核心人物，因此我们称这一次是以陈嘉庚为代表的倡议。

关于这一次中学倡议运动，叶钟铃（1992）有过较为详尽的论述，其云：

到 1917 年 4 月，陈嘉庚在道南学堂毕业典礼的演词中，透露了道南学堂堂长熊向父对创办中学的热忱及广帮首领、养正学堂正总理简英甫（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老板）的推动。熊校长曾往英属各地进行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迄 1917 年止，新马二地有近百名小学毕业生，具备报读中学的资格。随着这项调查的公布，创办一间中学的主张死灰复燃，在简英甫倡议及陈嘉庚附和，曾经召开一次会议，作为初步的行动，惟会议未取得任何成果。后来，简由于业务关系返国。此事亦就搁置下来。

而有趣的是，就正当陈嘉庚等人筹划办中学的同时，蓝伟烈也因受到章太炎之感召在心里持续发酵，且在这时爆发并与陈嘉庚等人汇流一处。

⁴⁷ 1916. 10. 6《章先生演说词录（再续）》。

⁴⁸ 1915. 8. 5《学务总会报告册》。其统计具体为 1792 男生、163 女生。

⁴⁹ 1915. 9. 2-30《学务总会调查华人在英文学校肄业之人数》。这里各校的所有数据都与上一年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两年之间的华人学生人数相距不大，这应该是当时相当稳定的数据。1915 年具体统计的各校总人数如下：礼佛英文学校 237、礼佛英文女学校 63、石堽岗英文学校 105、圣约瑟英文学校 744、美以美英文学校 1178、美以美英文女学校 218、域多利桥初等小学 420、区口林律英文初等小学 480、修道英文女学校 168、圣晏吨呢英文学校 175、圣晏吨呢英文女学校 24、亚利干教会英文学校 408、华英自由英文学校 501、美田英文女学校 327、中国英文女学校 235。

⁵⁰ 1915. 9. 3《学务总会调查华人在英文学校肄业之人数（十二续）》。

无论如何，从 1913 年以来的一系列倡议宣导活动，到了 1917 年 4 月份社会对于兴办中学的认识已蔚成风气；其显然与 1913 年胡惟贤倡议时期很不同。尤其我们对比 1913 年中华总商会接获陈嘉庚建议书后的婉拒，以及 1917 年陈嘉庚、简英甫、蓝伟烈等人无一不是总商会理事；其前后姿态之不同，乃至 1918 年及其后的中学董事会逾半数同属总商会成员⁵¹；即此应可体会蓝伟烈（1917）之自嘲当初“至稍观望，以为之俟，如鄙人者，亦又如是”。

其实，1917 年之能成为南洋华人筹办中学运动的一个里程碑，终乃催生 1918 年的筹办会，叶钟铃（1992）文中确实提到了其中的关键因素，即这一年标志着南洋学校高等小学毕业生人数的急增。如以最具代表性的道南与端蒙二校为例：道南学校 1906 年办学以来 1914 年始有首届高等班毕业生，然当年也仅 8 人⁵²；端蒙学校 1914 年为第三批高等学生毕业，当年毕业人数亦仅为 8 人⁵³。但无论如何，积累至 1917 年不仅中学生源储备了不少，更且各学校开设高等班者亦有所增加。此即 1917 年底冯右铗（1917）所慨叹：“且年来所得高等小学毕业之学生，亮不在少，其间必有抱进求高深之希望，以谋职业之技。然南洋群岛之中，又无中等程度之学校，供其需要，回国求学，事非易易。人才之损失于无形中者，又当不在少也。”此外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的是，1917 年 5 月中国政府委派黄炎培等人南来进行三个月的华侨教育考察，尔后黄炎培写成《南洋华侨教育商榷书》（1917[2015]），其中提到：“时势所趋，舆论所迫，今后政府必重视华侨教育。”这必然也极大鼓舞了南洋办学诸公。

当然即如上引叶文所云“此事亦搁置下来”，1917 年这次的倡议也未见真正落实，而是延至 1918 年当同德书报社带着国风幻境剧社历遍马来半岛九个城镇获得踊跃支持并筹得第一笔一万七千元的捐款，这极大鼓舞了筹办中学的信心。其中的关键点当然不会是那一万余元的捐款，而是南洋各地各界如此广泛的向心力与支持度；毕竟当同德书报社带着这个消息找陈嘉庚商谈时，陈嘉庚仅是通过身边人的走动，不到一个月就筹集了三万余元⁵⁴。

此外还有一点应予注意者，即南洋华人倡办中学声浪中实则还包含别样一种设想，即“小学兼办中学”，而从陈嘉庚 1918 年 6 月 15 日筹办会演讲中不难看出这种提议仍然存在。而陈嘉庚始终力排其议，坚持独立设一所中学，这也是他在这场南洋华人倡办中学运动的重要贡献之一，其云：

若小学兼办中学，无论其力办到与否，第以鄙人梓里所经历学校之经验观之，断然不合。盖中学小学两部份教员之资格，既各互异，而学生之年龄，又相悬殊，种种困难，不胜枚举。两校不宜混合，必须距离，方为两便。⁵⁵

总之上述“三度”倡办中学运动，以至于 1918 年成立筹办会，实则一定程度上是前呼后应的一个整体运动，而贯穿前后乃至最终促成其事的关键人物自然是陈嘉庚；但胡惟贤及其倡办之南洋英属华侨学务总会的推动作用亦应得重视。尤其胡惟贤在 1913 年以来的各方宣传疏导，以及为筹划中学所进行的一系列调查与资料整理工作，尤其学务总会联络当时南洋华人的教育界，强调统一与合作精神，这些都不断持续扩大，乃至 1917 年形成了南洋华社的向心能量，形成了社会态度的变更，认识水平的提升，其中学务总会应属居功不小。

（二）学务总会的承前启后作用

上文提过主催南洋英属华侨学务总会的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胡惟贤，自 1913 年以来在南洋各地乃至中国宣传推动兴办中学，更将其列入学务总会的重要工作议程，对于 1919 年成功办起南洋华侨中学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其中一方面正是其宣导工作恰恰连接起上述“三度”南洋华侨倡

⁵¹ 参看 1919.4.26《中校董事函》。

⁵² 1914.8.19《道南学校高等生毕业纪盛》。

⁵³ 1914.9.1《端蒙学校第三次毕业生姓名》。

⁵⁴ 参看 1918.6.18《筹办南洋华侨中学大会议之情形》。

⁵⁵ 1918.6.19《筹办南洋华侨中学大会议之情形（续）》。

办中学的呼吁；胡惟贤与学务总会在这场运动中当可看作是维持其薪火相续的灯芯。更重要的是其多年工作效应之挥发，不仅逐渐汇集起一帮办学人、垫高民众对于办中学的期望，更整体提高了社会对于联合办学、统一学制、提升学务的认识，最重要的是其进行的系列普查工作与资料收集铺垫了兴办中学所应具备的一切基础；其中当然也包括兴办学务总会过程中遇挫的经验教训。因此我们称学务总会在这场南洋华人“三度”倡办中学的运动长跑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南洋英属华侨学务总会，是民国伊始为了统摄南洋华人学校而设立的监管组织，最初的筹办处就设在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馆。最初 1912 年 8 月设立筹办处定名“南洋英属中华学务总会”，其后于 1912 年 11 月参考中国教育部的指令而通过议决将“中华”改为“华侨”；其工作宗旨是很明确的：“联英属七洲之地，合闽粤等省之人，无畛域党派之分，惟学务扩充是望。”⁵⁶

学务总会的最初发起人即时任总领事的胡惟贤与当时养正学校校长宋木林（参看一郎 1920a）。根据胡惟贤在该会开幕致辞所称：

学务总会何为而设也。初非以南洋英属之学堂林立，势如散沙，各自为学，人自为师，而有所不满于中也。良以中学之造诣，既邃且密，西学之程度，既高且深，居今之世，为今之学，必欲精益求精。于是慎之又慎，乃设斯会以统一之、以研究之。（胡惟贤 1914a）

对于成立学务总会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时人是有共识的，如 1920 年的一份公开意见书仍称：“此会不仅为联络感情交换知识起见，直是南洋教育兴废盛衰存亡生死之关系。”（职民 1920）而分析此必要性之主因，即当时南洋学校缺乏统一监管，如云：

今华侨学校，虽有数十所，而课程办法，各自不同，所定章程，其中不免有失之迂谬，或失之繁重，且有视萌芽如枝干，视基础如栋梁者。他如名称之混淆，经济之困难，其影响于教育者，虽有大小之不同，而足以为进步之累者则一。⁵⁷

南洋办学多年，各学校成绩何如，人各有耳目，似无容滥费笔墨，反类于刘四骂座。即有成绩优良者，亦皆各行其是，满盘散沙，绝少团结之力。（职民 1920）

既是有此必要性，但如上文所述学务总会自筹办至成立后却始终是路途多舛。从成立之初的 1914 年，胡惟贤（1914b）呈书中国教育部就称：“上年虽经公议，在新加坡拟设南洋英属华侨学务总会，希冀统一，今年春间，勉强成立，而人各一心，事各一见，主其事者，又难得深通中西教育之人，以致一无表见”，乃至 1920 年讪者仍比之曰：“坡中之有是会，亦告朔餼羊之例耳。”（一郎 1920a）从初期之艰难到后来乃成“告朔餼羊”，当中不免有其自身包括人事在内的诸弊端；但其中贯穿前后的关键客观因素，则 1914 年学务总会正式开幕之初就曾道破，其云：

“星洲学务总会筹办之始，福潮各校学董，未知有何必要。”（旁观者 1914）这段话已明言学务总会既是要打破帮群分隔的办学格局，而其受到当时方言帮群的漠视，其活动与管理之遇阻则自在情理中。更何况学务总会 1915 年第一次刊布的《意见书》中还明确批评云：“盖南洋各埠之学校，多为福潮客广琼等帮人所创设。甲帮之学校，往往不收乙帮之学生，丙帮之生徒，往往不能进丁帮之学校。”⁵⁸

在很大程度上，面对当时方言帮群学校界限分明的社会环境，筹办一所南洋华侨中学与学务总会所遇到的困难是有其共性的；因此理解学务总会的困境，多少就能帮助理解南洋华人历次倡办中学都未果的原因。于是我们可以联系起来，1919 年南洋华侨中学议决正式校董之成立规定各方言帮群按名额分配推举人选，终乃因各帮人选未定而正式校董的成立一延再延⁵⁹。当然相比之下学务总会所遇到的阻碍绝对远远大于筹办中学。首先，学务总会作为教育监管性质的机构，难

⁵⁶ 1913. 6. 2《英属华侨学务总会筹办处启事》。

⁵⁷ 1915. 3. 17《学务总会意见书（七续）》。

⁵⁸ 1915. 3. 9《学务总会意见书（二续）》。

⁵⁹ 参看 1919. 3. 23《南洋华侨中学校催举正式校董》。

免与政治关系密切，尤其 1914 年中国教育部颁布《领事经理华侨学务规章》就是明显的中央权力体现。而中国社会初期的政治动荡就注定其不免有民国早期政党政见的介入，因此其初期名称的数次更易，由最初“南洋英属中华学务总会”至“南洋英属华侨学务总会”，最终则“南洋英属华侨教育总会”，其中字词的替换亦多少即受到当时社会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即一郎（1920a）所云：

初，胡惟贤为总领事官，养正学校校长宋木林氏，与其发起，名为中华学务总会。嗣宋氏投降国民党，因讨好于同系，又将招牌改为华侨教育总会。暗占胡位，因是与之大生意见，几不谋面。

这也正是学务总会筹办阶段迟迟毫无进展的原因，乃至正式成立之后仍继续发酵，如其于 2 月底行开幕礼，但 3 月 2 日就发通告云：“本学会评议、治事两部长，宣告辞职。”⁶⁰。

其次，自颁布《领事经理华侨学务规章》，其规定总领事管理事项包括：“一、对于各华侨学校宣达教育部法令；二、对于华侨学务上之纷争调停或处理之；三、遇必要之时得向各学校表示意见，指导改良。”（檳城新报 1914a）而学务总会初成立发布《意见书》，曾明指出南洋华人学校管理上的一处弊端，云：

内地学校不设总理协理等职，校内行政，校长任之；华侨学校多由侨民中公举热心公益、明白事理者多名，以负筹款保护之责，名之曰董事。董事以人数众多，不得不互选一二人以总其成。故设总理一人或二人，以资表率。又以校务繁重，不可不另举二三人、或三四人为总理之辅助，故设副总理、协理等，以分其劳。此种办法，非不美善，但总董与校长教员，若之划分权限，则冲突之事，在所难免。⁶¹

而终乃言及学务总会的“指导改良”意见云：“今欲清除积弊，必先明定责成，定限分权，实为今日学校改良入手第一办法。”

仅凭这一点，就不难明白当时社会整体对于学务总会的隔阂乃至戒心，特别是各方言帮群及其学校。因此我们说筹办中学与各方言帮群学校之间虽难免间接利益冲突，但涉及面不大，各帮或许仅为不够积极热心，但不至于漠视，甚且大体上是乐观其成的；然而对于学务总会则涉及到切身关系，尤其学务总会若筹划直接介入学校内部的行政管理，乃至教学与课程等等，那就明显是直接而全面的利益冲突了。

于是学务总会始终未得学校的普遍支持，议者多以此为学务工作无法开展的主因，如云：“而向来会务，更无教育界之合群力以维持之，遂致空有其名，办法未善，精神缺乏，一蹶不振。”（何悟凡 1917）乃至结果即学务总会无以行使其使命，终于内外部组织亦涣散，如云：

教育会者，南洋教育之机关也。然星洲教育会，是否为英属教育界全体所合组，是否为英属教育界全体所公认，是否有名无实，等于告朔之羊，是否会自会，校自校，会不令于校，校不服从于会，识者谓教育界欲放异彩，重新组织，势不能免。（职氏 1920）

更甚者，如 1920 年总数十九名新加坡理事中的十三名理事联名请辞之公开信称：“现在星洲议员约十九名，多次开会，俱不足法定人数。”（陈安仁等 1920）同时公开信中还揭示云：“且查本坡如中学、道南、端蒙、南洋女校、华侨女校、爱同、应新、兴亚等校，亦未有议员。”可见即使新加坡教育界内，对于这个统摄性质的总会，其内外态度都极度冷漠。

终于在 1920 年时人乃直接发文哀叹“呜呼教育总会”，只是其文中却将全部责任推之于领导与管理，云：“有经商之力，而无办学之才，可以致富巨万，而不能办一学务总会。吁嗟乎异哉。……呜呼教育总会，呜呼教育总会之职员，庶几改之，予日望乎。”（一郎 1920b）这虽不算错，但却未道及问题的症结所在，只是这正是当时社会的普遍意见。

⁶⁰ 1914.3.2《学务总会通告》。

⁶¹ 1915.3.9-10《学务总会意见书（二续）》、《学务总会意见书（三续）》。

纵使学务总会始终艰难经营，但其宗旨与意义毕竟是获得一定社会认同的，这由其初期如 1916 年理事名单即能窥见一斑，其中除了新加坡主要学校总理如林文庆、陈嘉庚、简英甫、林义顺、吴胜鹏等，还包括马来半岛上的学校总理暨重要社会领袖如檳城的张弼士、戴春荣、胡子春、邱汉扬，吉隆坡的张煜材、陆秋泰、杨宜斋，马六甲的沈鸿柏、曾江水，还有麻坡的颜经文等人⁶²。

而至于上举 1920 年未有代表加入学务总会的学校名单中包括南洋华侨中学，但可以肯定地说学务总会与中学绝非毫不牵连；至少在筹办中学的前后期间学务总会的一批核心领导，同时也是筹办中学的重要干事。比如总会初期继宋木林去职引发混乱之后而起来重新组织的陈赞鹏与何国基，总会更名“南洋英属教育总会”正由此二人（参看一郎 1920a），他们同时也名列筹办会第一届临时董事⁶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何国基本人就是当初国风幻境剧社的创办人及“该社之重要分子”之一。⁶⁴

此外 1918 年与 1920 年的两届学务总会多位主要领导也都在筹办中学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除了上述二人，尤值得注意者如曾江水、何仲英、吴胜鹏，他们三人同时都是 1918 年 6 月最初公布成立中学筹办会的“南洋华侨中学筹办人小学总理”成员⁶⁵。其中曾江水、何仲英分别担任 1918 年学务总会的副会长与财政⁶⁶，同时也是 1918 年中学筹办会临时董事以及 1919 年正式校董⁶⁷；而何仲英更是从筹办会到中学董事会都担任查账职务。至于吴胜鹏，则是 1920 年的学务总会主席⁶⁸，同时也是中学筹办会临时董事会的查账⁶⁹，更是第一届正式董事会的副总理⁷⁰。吴胜鹏同时也受到继陈嘉庚后升任中学总理的林义顺所信赖，即林义顺任总理后第一次主持会议所提出的议案：定于每逢周二与周五下午四辆汽车同出募捐；其中受委“预备摩多车”的四人中包括吴胜鹏⁷¹。

此外，若论更早则南洋华侨中学初期二任董事主席陈嘉庚与林义顺也都曾担任学务总会 1916 年的理事，林义顺甚至还是当年的副总理⁷²。

正如上文提及，总会在其集合各帮派学校之力以提升整体学务上之性质，与筹办中学的工作有其共性；包括当 1913 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婉拒陈嘉庚之献议，与 1912 年以来学务总会始终处于筹办阶段，其面临的方言帮派畛域界限之社会因素是共同的，简言之即“福潮各校学董，未知有何必要”（旁观者 1914）。而自 1914 年总会成立以来，虽然各方态度冷淡，但是毕竟各学校须合力划一学务之重要性的意识已渐入人心，因此当 1918 年倡议“尤不容不合办”之中学筹办会即能一呼百应。尤其无法忽略的是学务总会正式成立初期的 1914 年胡惟贤（1914b）所称侨学弊端，其云：“所为富商捐资办学者，颇不乏人，苦于省自为界，人自为学，各操土音，都无远见。……且校舍既系公立，经费又属自筹，性质独立，不愿受局外之干涉”，乃至 1915 年总会理事“议决举办之事”所列之学务弊端，包括学制管理、课程讲授等节，与其所关切之小学之教学质量、教师培养诸问题，这些在在都与 1918 年后陈嘉庚等人所不断重申的南洋华侨筹办中学之必要性诸端，明显有极大程度的重合。更属关键的还有提倡教育应该“合办”。从 1913 年胡惟贤倡办学务总会时就宣称：“学务总会系联英属七洲之地，合闽粤等省之人，无畛域党派之分，惟

⁶² 1916. 6. 3《学务总会大会纪闻》。

⁶³ 1918. 7. 3《南洋华侨中学筹办员总录》。

⁶⁴ 参看 1915. 12. 8《国风幻境近况纪闻》、《退社声明》。

⁶⁵ 1918. 6. 8《实行筹办南洋华侨中学之通告》。

⁶⁶ 1918. 10. 2《教育总会选举会长纪事》。

⁶⁷ 1918. 7. 3《南洋华侨中学筹办员总录》；1919. 4. 10《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职员表》。

⁶⁸ 参看 1920. 5. 5《教育总会开会》。

⁶⁹ 1918. 6. 27《南洋华侨中学第一次董事会议案》。

⁷⁰ 1919. 4. 9《南洋华侨中学校复选正式校董纪要》。

⁷¹ 1919. 6. 1《南洋华侨中学校正式校董第四次议案》。

⁷² 1916. 6. 3《学务总会大会纪闻》。

学务扩充是望。”⁷³ 嗣后仍多时多处一再重申，而其学务总会 1915 年的《意见书》更明言：“凡我华人，当皆以破除界限普及教育为念，学校招生，万不可各分畛域，聘用教员，只问其能否胜任，不当问其为何省何帮人也。”⁷⁴ 而筹办中学的最初《通告》也称中学“尤不容不合办”，其后陈嘉庚就任筹办中学临时董事主席的演说也说：“故南洋中学，尤不容不合办也。”⁷⁵

最后，总会自成立以来所进行的诸项侨学调查与工作，最低限度上对于联系起各地学校校董校长至少是能起到积极作用的。比如上文曾提及的“华侨学校学生”与“华人在英文学校肄业之人数”⁷⁶，又且据其 1916 年的报告之总结云：

南洋英属学务总会成立以来两年于兹，对于侨学应办之事，如调查私塾、调查中英学校、创办国语讲习所、设教育研究会、禀请教育部奖励热心捐资兴学侨商等。⁷⁷

于是我们无法否认的是，学务总会自成立以来的种种措施与工作在倡办中学的运动中确实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为 1918 年的筹办工作铺垫了应有之条件，于是水到渠成，其后之短短十个月内便得以顺利开学。

（三）1918 年以前的升学管道

1918 年筹办中学的通告宣称：“凡我英荷各埠闽粤诸同胞，须知南洋华侨中学，与我海外侨胞之成败存亡，大有最密切最重要之关系。”⁷⁸ 上文经已列举南洋华人办中学的必要性，包括从教育发展上则关乎小学毕业之升学、小学教师之培养，至于学校管理上则是小学教育之质量、小学学制之统一等等。

可以理解后二者是当时“性质独立，不愿受局外之干涉”的帮群学校所难免存戒心的；但对于前二者，尤其升学问题却绝对是多数人都极度关心，包括各帮群学校的校董校长。然而又何以筹办中学竟一延再延。究其原因除了“合办”之难，还应指出当时升学相关的两方面情况：其一，整体而言当时华文高等小学之真正毕业学生人数比例较低，比如 1915 年学务总会就提及：“查各埠学生，中途退学者，大约十居其九。此九人中，因生计艰难，急于改业者，约得一人；随父兄归国，或往别埠者，约得一人；此外则改习洋文矣。”⁷⁹ 因此其建议办中学，乃言：“兹拟调查本年高等小学毕业人数，如在三十名以上，则从速与各校总董筹商开设中学校，如不及三十名，则按照部章，设补习科。”⁸⁰ 也正因此 1918 年筹办中学时生源人数也是最受关切的问题，且甚于经费；此中当然还包括学生素质问题。其二，实际上当时是有几条升学管道供华文小学毕业的南洋华人子弟们选择，其中虽也有些本地升学机会，但主要仍是在中国。以下略作介绍。

首先是在南洋本地⁸¹。上文提过，1915 年学务总会倡议办中学的时候就担心整个南洋高等小学毕业的学生人数太少，乃至不足以支撑一所中学。这个担忧自然是一直持续到 1919 年中学开学后仍是如此。然而我们若以 1915 年的数据分析，则学务总会所定 30 人的标准实在不算低，比如创校于 1906 年的道南学校，当年在新马堪称最大型且办学最受肯定之一，其 1914 年首届高等小学毕业生人数仅 8 人⁸²，乃至 1915 年其称“自开办以来学生名数以本学期为最多”的学生总数，按其当年中文班大考人数计算为：高等分二班共 21 人（1 人缺考）；初等班分六班共 247 人（4

⁷³ 1913.6.2《英属华侨学务总会筹办处启示》。

⁷⁴ 1915.3.9《学务总会意见书（二续）》。

⁷⁵ 1918.6.19《筹办南洋华侨中学大会议之情形（续）》。

⁷⁶ 1915.8.5《学务总会报告册》；1915.9.2-30《学务总会调查华人在英文学校肄业之人数》。

⁷⁷ 1916.2.23《黄总理之热心》。

⁷⁸ 1918.6.8《实行筹办南洋华侨中学之通告》。

⁷⁹ 1915.3.4《学务总会意见书》。

⁸⁰ 1915.3.16《学务总会意见书（六续）》。

⁸¹ 这里谈南洋本地小学毕业生之升学管道，专谈华文学校及华文教育范围内。上文曾提过新加坡华人学生在英文学校学习人数远远超越华文学校，其中包括英文中学的华人学生。但这里仅仅是讨论华文小学及其毕业后的华文教育升学管道。

⁸² 1914.8.19《道南学校高等生毕业纪盛》。

人缺考、1人退学)；高等补习班23人(2人缺考、1人回国)；初等补习班共29人(1人缺考、1人告退)；高等补备班共17人；初等补备班共37人；此外另有转学及告退者12人。⁸³

这个名单数据可以明显看出当时高等与初等人数比例差距之大；即高等21人与初等247人的差比，即可体会学务总会所说的：“查各埠学生，中途退学者，大约十居其九。”⁸⁴其云“十居其九”实在一点不夸张。更何况当时多数学校都未设高等班。同时还应注意的是，同是道南学校1919年的高等小学毕业生人数也还是维持着8人。⁸⁵

仅仅这样的数据，我们就可以明白1913年胡惟贤各处奔走以及同年陈嘉庚去函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倡办中学之时，各界不甚积极的反应多少有其道理的。这就是我们上文总结历次倡办中学未果原因之一的生源问题。然而到了1917年陈嘉庚为代表再议办中学，客观条件已很不同了。这时期积累下来的高等小学毕业人数已有相当的数量。

上文提及《学务总会意见书》提出若中学生源不及30人则设“补习科”，结果中学固然未办成，似乎连这个补习科亦未付诸实践。倒是《意见书》之后直接提出设立“国语讲习所”和“师范讲习所”，其中师范讲习所设于养正学校讲堂⁸⁶，当年6月10日就开课，首批“练习员计二十余名”⁸⁷。这个师范讲习所是“为养成蒙学教师而设”⁸⁸，主要为“各私塾教员及有志教育者”进修教育学。这不失为南洋子弟升学之所，但更关键目的还是为提升小学教师素质。同时随着小学数量日增，学生也跟着增加，其他学校也都跟着开设师范讲习科，如1917年南洋女子学校附设师范讲习科及专修科，招生目标中包含“初等小学四十名，高等小学四十名”⁸⁹；又如同年冯右铤(1917)甚至呼吁“南洋宜速办师范书”，其云：

且年来所得高等小学毕业之学生，亮不在少，其间必有抱进求高深之希望，以谋职业之技。然南洋群岛之中，又无中等程度之学校，供其需要，回国求学，事非易易。人才之损失于无形中者，又当不在少也。是今日者宜亟设师范以容纳之。一方为改良小学教育之预备，一方为小学毕业生谋一出路。计无有善于是者。

这段话中正道出了1917年在南洋华人教育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即上文所提及的，这一年标志着南洋学校高等小学毕业生人数急增。

同时也在这一年，中国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公派南来考察华侨教育，并多番宣传其“职业教育”理念，如其于8月份在荷属学务总会演讲，提到“注重职业教育”⁹⁰，又于同年10月写成《南洋之职业教育》；尤其他在《南洋华侨教育商榷书》中提及：“吾因而确认南洋社会需要商业教育，实有非常迫切之情势，则非仅在小学略授以商业知识，如所谓预备商业教育者为克能满足其要求。”(黄炎培1917[2015])在其号召下，南洋不少学校都增设商业科。比如1918年爱同学校增设商业科，论者雀跃云：

然中学之倡办，迹来声浪，不为不高，徒以经费难筹，用人不易，至今尚无头绪。而学生之穷途如故也。为今之计，莫如多开乙种商业科，俾学生毕业后，或益进于学，或入工商各界。左之右之，无施无不可也。昨阅爱同学校改组商业科之宣言，及招生广告，关心教育者心目中，顿生无限之快感，以为爱同学校，善能审时度势，务所当急。⁹¹

⁸³ 1915.8.17-19《道南学校全体学生大考一览》。

⁸⁴ 1915.3.4《学务总会意见书》。

⁸⁵ 1919.7.15《道南毕业生》。

⁸⁶ 1915.4.30《师范讲习所定期开学》。

⁸⁷ 1915.9.1《学务总会报告册(八续)》。

⁸⁸ 1915.3.25《南洋英属华侨学务总会倡办国语讲习所简章(四续)》。

⁸⁹ 1917.7.27《南洋女子学校附设师范讲习科及专修科招生广告》。

⁹⁰ 1917.8.31《黄炎培氏对于南洋荷属华侨教育界之演说》。

⁹¹ 1918.2.19《善哉爱同学校之改组》。

此后乃至 1920 年更在新加坡单独成立了一所“南洋工商补习学校”，并获得社会普遍支持，包括时任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伍璜更出任学校的名誉校董（友生 1920）。当然，黄炎培考察南洋华人教育之后的最重要工作实则即回国极力倡议复办暨南学校，并很快就在 1918 年 3 月份开学，为南洋华人子弟升学开拓了另一条管道；这也极大程度上显示出南洋子弟对于中等以上教育的迫切需求甚至获得中国教育界的重视。

接下来则讨论南洋子弟到中国继续升学。1918 年最初公告筹办中学的函件就称：“凡小学毕业欲升中学者，必回祖国，跋涉路程，诸多不便。”⁹² 可见除了南洋本土所设的一些专门课程，去中国继续升学是 1919 年办中学以前的唯一出路。在 1918 年暨南学校复办以前，中国多处学校实际已在招收南洋学生，只是数量都不多，也算不上积极；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也都有南洋学生。尤其在 1918 年以后，中国不少大学都优待招收南洋学生，比如北京的中国大学从 1919 年 7 月特别派人南来招生，并公告：“本大学与今年九月，特设华侨预备班，按其程度，斟酌课程，以为侨生升入中学以上之准备。”⁹³ 更有中国政府下令大学增收南洋学生，如 1919 年 5 月“（中国）外交部训令，清华学校增设南洋侨民学额，由各总领事招生在案”，且列明招生办法云：

本总领事定于六月十四日上午十钟，在本馆当面考试。兹特先登报俾周知。凡在南洋英属华侨子弟，年在十四岁与十五岁，尚未订婚，读过国文英文书籍，有志投考中等科肄业者，应届时到馆，由本馆领事当面考试，以备录取送京。⁹⁴

1918 年以前南洋子弟的升学优先选择，实则多集中于上海的学校，应以复旦公学为最多。比如较早在上海成立的南洋华侨学生会即上海复旦公学华侨学生会，其云：“是用组织斯会，并附设招待部，为便利华侨子弟就学此间而设。区区之忱，无非欲南洋同胞，尽沾祖国文明之化，用以改良社会。”⁹⁵ 紧接着又于 1918 年 3 月组建上海华侨学生会，并定期派委员“前赴南洋总汇之区，劝令侨生回国求学”⁹⁶；这个学生会急速壮大，甚至“北京大学及清华学校华侨学生均来函，愿入本会为会员”⁹⁷。

南洋学生往中国升学人数显著的增多，主要是 1918 年中国复办暨南学校之后。上文提过，黄炎培 1917 年 5 月受委南来考察华侨教育，归国后极力主张中国政府“必重视华侨教育”。其中一项措施就是恢复民国元年以来就停办的暨南学校。1918 年 3 月暨南学校正式恢复开课，并由黄炎培担任首任校长（参看熊杰、夏泉 2010）。其复办宣言语重心长地说：

本校废止于今六年，兹者筹办规划之宗旨遍告我侨南同胞。近顷以来，南洋华侨学校亦已进矣，而当局者困难之程度与之俱进。有毕业生而无相当之升学机关，求良教员而无特设之培养机关，回国就学者日渐发达而无指导之人，学科程度或有参差而无补习之地。此侨南同胞所引为大憾，亦祖国朝野上下所共抱不安者也。今将原有之暨南学校从新恢复，扩充规模，改良办法，分设专科，并经营有利于华侨教育之各种事业，总以华侨子弟回国者得受适宜之教育，造成有用之青年，以增进华侨文明程度，发达华侨实业为宗旨。（黄炎培 1918）

其招生条件明列：“凡年十四岁以上，有高等小学毕业证书，或虽无证书而有相当之程度者，均可来本校就学。”可见黄炎培很清楚华侨高等毕业学生人数的急增正是当年复办暨南学校的重要且必要因素。

⁹² 1918. 5. 3《侨胞筹办本坡中学》。

⁹³ 1919. 7. 17《优待侨学生》。

⁹⁴ 1919. 5. 7《总领事馆通告》。

⁹⁵ 1918. 1. 29《上海复旦公学华侨学生会缘起》。

⁹⁶ 1918. 4. 10《教育通函》。

⁹⁷ 1918. 5. 27《上海华侨学生会纪闻》。

从课程上，暨南学校也是多为南洋华人子弟量身定制的，即最先以商业科和师范科为主；如其《南洋华侨教育商榷书》中已明言“吾因而确认南洋社会需要商业教育”。至于师范则 1915 年以来学务总会就以多方强调培养优质师资对于南洋华人教育发展的必要性。正因如此，暨南学校在复办之初就深获南洋华人学生的青睐。如云：

暨南学校系中央教育部应南洋各属之要求而设，专收华侨子弟，教以南洋所须要之知识技能，并发达其爱国思想。校址设在南京，为长江流域之中心。成立未及一年，学生已达一百六十人。⁹⁸

其中“专收华侨子弟”难免太绝对，实则据其统计大约是“华侨学生居十分之七”，如 1918 年 19 月的数据统计云：

商业科学生三十人、师范学生五十人，另有预备升入本校专科或他校之补习班学生三十余人，又有附属小学学生三十余人，计学生一百四十人。其中华侨学生居十分之七，国内学生居十分之三。⁹⁹

当然，暨南学校获得南洋学生的大力支持更是因为受到了教育文化界的推动。从目前所见，1918 年 3 月份暨南学校正式复课，本地社会对于学生深造入学极致关注，比如宽柔学校由校长亲身陪同当年的 6 名学生到南京报到，暨南校方来函云：“柔佛宽柔学校校长林木卿君躬送学生四人回国，欲就学敝校，无任欣幸，至同行林朱二生，自当一体酌量程度，允其入学。”¹⁰⁰ 另外，南洋英属华侨学务总会也宣传组织定期护送学生入学报到，如 1918 年 3 月“第一期由叻出发学生六名”，而“第二期拟定阳历四月内，筹送归国，如有志就学于暨南学校之侨生，祈往总会报名。”¹⁰¹

由此可见，黄炎培的判断是很准确的，即当他 1917 年南来考察南洋华人教育时，就意识到当时南洋高等小学教育已很稳定，社会已积聚了足够的生源发展中等以上之教育。而这也就是我们上文一再提及的，南洋华人倡办中学的一系列运动中唯独 1917 年始能获得较广泛支持且最终得以付诸实践，这个客观条件是关键。

二、1919 年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开学纪事

南洋华人“十年于兹”的倡议兴办中学，1917 年终于形成足够的社会支持；但多数人仍还是只愿意充当支持者，若蓝伟烈所自嘲的“至稍观望，以为之俟”，即缺少一个挺身统领其事者。

究其主要原因仍是对于办中学的可行性存有疑虑。毕竟前此虽经多人倡议却丝毫未见实效，社会已有不少“徒托空言”的讥讽；具体到 1917 年前后的倡议亦然，如上文引述“今尚有拾太炎之唾余者”的嘲讽文，其末尾即云：“为学不在多言，顾实有如何，有志者其念之哉。”¹⁰² 再如 1917 年一波筹办中学运动倡议人之蓝伟烈，登报“敬告同胞”以示决心的同时，仍不无焦虑地说：“惟恐单凭口舌”（蓝伟烈 1917）。

对于 1917 年 4 月份陈嘉庚领衔的倡议活动诸人，仅仅半年前章太炎南来倡办中学犹受人奚落，这对他们不能说没有影响，于是难免再度公开倡议时乃多一番踌躇。

由此可见，1918 年筹办会的成立，同德书报社和国风幻境剧社实际上仅仅是一星火花，但社会原就积蓄的强大燃烧力却因此引爆。由其筹得的一万七千元首笔捐款，说实在只是凤毛麟角，但却足以触发接下来如火如荼的筹办进展，乃至在短短十个月后就中学正式开课；具体分析，

⁹⁸ 1919. 2. 21《侨界学生须知（续）》。

⁹⁹ 1918. 10. 22《南京暨南校多华侨生》。

¹⁰⁰ 1918. 4. 9《教育通函》。

¹⁰¹ 1918. 3. 8《本坡学生有欲回国求学乎》。

¹⁰² 1916. 12. 20《中学堂新旧帐》。

其二者的主要贡献绝非那一万七千元的捐款，而是带来了两方面积极作用：一是传达了马来半岛各地对于办中学的广泛支持与高度热情；二是挺身承担社会冷言的风险而充当急先锋打出头阵。

历数 1918 年成立筹办的过程，目前资料还是较为详尽的。首先是 1918 年由国风幻境剧社历遍马来半岛九个城镇演剧筹款，再经新加坡同德书报社主持其事，于 5 月 3 日发出联合公告云：

故筹办中学，势难已已。前曾经数热心家发起倡办，着手进行，嗣因他事阂阻，不克早日成立。继得国风幻境诸君肩任，公同遍历各埠筹款，计所历九埠，承各该埠热心家赞助，已捐有的款约一万七千金。¹⁰³

紧随着又于 5 月 5 日召集会议共商筹办法，报道云：

南洋中学设立之事，酝酿经年，近始由热心诸子，于五月五日下午，假座同德书报社开会，筹商办法，到者四十余人，各团体均有。一时开会，五时散会，指名举出临时筹办员八人：徐统雄、吴炽寰、周献瑞、陶哲臣、袁舜琴、许柏轩、何仲英、曾汝平诸君，并指名举定临时书记一人顾钟华君；并议二星期后再开会筹议云。¹⁰⁴

当然同德书报社会议诸人此前就已获得陈嘉庚的支持并叮嘱，云：“况复得陈嘉庚先生应许热心赞助耶。所愿董其事者，慎重将事，俾天南教育前途放大光明。”

此后由马六甲培风学校和新加坡十五所学校总理组成 16 成员的“南洋华侨中学筹办人”，于 1918 年 6 月 8 日刊发《实行筹办南洋华侨中学之通告》，公布 6 月 15 日下午 2 点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开特别大会；其时“到会者人数颇众，公举陈君嘉庚为临时主席”，且此时捐款已达五万元¹⁰⁵。根据陈嘉庚当天的演讲，其云：

近因同德书报社诸员，特举代表，重以此事商之鄙人，而鄙人欲偿夙愿，遂不自顾绵薄，毅然为之而不辞。第恐经费无着，未敢冒昧，爰先谋之同志，得三万余元，合诸国风幻境演剧捐助万余元，共得五万之的款。乃遍询各校总理得其同意，故刊发通告、召集大会。¹⁰⁶

因此可以说自同德书报社与国风幻境剧社在马来半岛九个城镇筹得捐款，其后的组织与筹划等工作基本则由陈嘉庚统摄其事。筹办会成立之后的发展如火如荼，很快的从成立董事会、择定校地、聘任校长教师、考试招生、备齐设施，乃至短短十个月后的 1919 年 3 月就正式开课。

（一）董事会工作纪要

1918 年 6 月 15 日成立临时董事会，选定陈嘉庚为主席。陈嘉庚在这次会议上做了非常重要的讲话，然后公议几个重要事项：

一、表决中学校地点，指定新加坡；二、表决定名曰，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三、表决临时校董，以此次到会并列名筹办之小学校总理充任之，公推陈君嘉庚为临时总理，林君义顺为临时副总理；四、表决筹办处，暂设本坡中华总商会内；五、表决庶务员书记员，由总理聘任。¹⁰⁷

嗣后 6 月 26 日召开第一次董事会，这次会议并无大事议决，其中最重要的是讨论校舍地点并决定“在本坡利民律，即竹脚电车总局附近之处，有便屋可以开办，有旷地可以更张”¹⁰⁸。接下

¹⁰³ 1918.5.3《侨胞筹办本坡中学》。

¹⁰⁴ 1918.5.6《冀望中学早日成功》。

¹⁰⁵ 1918.6.18《筹办南洋华侨中学大会议之情形》。

¹⁰⁶ 1918.6.18《筹办南洋华侨中学大会议之情形》。

¹⁰⁷ 1918.6.22《筹办南洋华侨中学大会议之情形》。

¹⁰⁸ 1918.6.27《南洋华侨中学第一次董事会议案》。

来7月3日则正式公布筹办会的临时董事名单，一共56人，其中带职务董事4人，即：“临时正总理兼财政陈嘉庚，副总理林义顺”，“临时查帐员何仲英、吴胜鹏”。此外还有委任的“庶务兼书记王会仪”。¹⁰⁹

王会仪乃“闽南儒士也”，“初主《星报》笔政，后任《天南报》经理，后助吴寿珍组织总商会”；他对新加坡福建人办学贡献不小，包括参与倡办道南、崇正等学校，而“最有益者，莫如将天福宫、顺天宫二神款，移作崇福、崇正、崇文三校之费，实闽侨子弟受教育普及之幸福，皆先生变通办法之力也。”¹¹⁰王会仪是陈嘉庚亲自礼聘担任筹办会职务，且其时也同任总商会座办，深得陈嘉庚重视。

7月6日临时董事会开第二次会议，做了几项重要的议决。首先购置校地已付定金，其价格为“二万七千元”，且公举陈嘉庚、林义顺、何仲英、吴胜鹏、曾江水，5人“同为购置校舍签名主券管业员”；另外还公决购置“校具仪器”做法。其次是“公决启校日期，预定阳历新年二月，即阴历己未年正月”，还有“公决招生期限，由出报后限三个月截止”；再次是“公决延聘校长”，云“应由陈总理函托上海教育会会长黄炎培先生，审慎访聘，苟得其人，则遴选教员尤所惯熟，可以连带负责”。¹¹¹

紧接着7月11日又开第三次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学生费用，其云：“学费每月四元，到校时备缴半年之额”、“宿舍油火费每月二元”、“伙食分两则，住校三餐者每月六元，早晚家食而在校午餐者每月二元五角”。此外还讨论减免困苦学生的部分费用。

7月15日印发《南洋华侨中学招生简章》，且于8月27日至10月18日的《振南日报》上刊布发送《招生简章》的各埠各校，包括马来半岛、婆罗洲、印尼爪哇、缅甸仰光、新加坡；计有爪哇各地共110所学校、仰光共76所学校，又马来半岛共89所学校，分别为：檳城18所、吉打4所、吉隆坡19所、马六甲3所、霹雳25所、芙蓉8所、彭亨7所、柔佛5所。

12月10日董事会开第四次会议。首先，商讨“校舍之修改布置，公举陈嘉庚、林义顺、秦乐钧、吴胜鹏、曾汝平、黄有渊，六君为专员，任便设施”。其次是“校长现经聘定”。最后则是汇报报考学生总数至此为58人。¹¹²

1919年2月7日，“南京暨南学校代表黄君炎培、韩君希琦，偕同聘任中学校长涂君开輿”乘轮船从上海抵达新加坡；并“由中学总理陈君嘉庚，特派专员以汽车到码头迎迓，先到中华俱乐部，赴副总理林君义顺之接风宴。”¹¹³

2月18日董事部开第五次会议，此时办校的基本设施都已大体到位，比如宿舍装修、桌椅床具等也都已订购，图书仪器也已向上海商务印书馆订购。至于教师，则涂校长已招得4位教员，其中李幼泉已随涂校长抵达新加坡，另3人也已在航道上；至于“英文教员议由本坡选聘”。此外汇报报考学生总数共76人，“外埠四十一名，本坡三十五名”；同时“择定三月十三号召集学生，在商会试验”。这次会议还议决，“择定三月二十一号开幕授课”。然后是商议拟定“学校章程”与“校长任务规章”，并“由主席推举吴胜鹏、吴有胜、黄仙舟、黄有渊、何仲英、邱菽园、王会仪，诸君将所拟稿件负责审查，即行公布”。最后，主席陈嘉庚提出，“临时校董筹办整齐已告成功，应该选正式校董”，而公议结果为：“以本坡男女各校之正总理若干名，另仿总商会职员定额，由各帮再行补举计闽帮十三名、广帮五名、潮帮九名、客帮三名、琼帮二名，闽粤之外另有各省侨胞应选四名，合计五十多名，为正式校董。任期一年。”¹¹⁴

3月13日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行招生考试，考试科目分国文、英文、数学。到场考试学生共93人，其中新加坡学生44人，其他南洋各地47人，又有广东、福建各1人。南洋各地学生，

¹⁰⁹ 1918.7.3《南洋华侨中学筹办员总录》

¹¹⁰ 《叻报》1929年9月5日《悼王会仪先生》（LP0014009）；另参看颜清煌（2017：77-122）。

¹¹¹ 1918.7.8-9《南洋华侨中学第二次董事会议案》。

¹¹² 1918.12.11《南洋华侨中学第四次董事会议案》。

¹¹³ 1919.2.8《中学新聘校长抵坡》。

¹¹⁴ 1919.2.19《南洋华侨中学第五次会议案》。

计有檳城 4 人、马六甲 4 人、巴生 6 人、吉隆坡 6 人、怡保 2 人、太平 2 人、文冬 4 人、吉兰丹 1 人、关丹 2 人、美邦 1 人、廖内 13 人、坤甸 2 人、勿里洋 1 人、仰光 2 人、峇眼 1 人。¹¹⁵ 考试成绩于 3 月 15 日揭晓，并于 17 日公告，结果取“正科学生四十名”、“补习科学生三十八名”，一共 78 人。¹¹⁶ 其中正科录取的 40 人中，新加坡 31 人、马六甲 3 人、檳城 2 人、巴生 2 人、勿里洋 1 人，另有 1 人未列入考生名单¹¹⁷。从地域上看，新加坡 44 名考生中，正科录取 31 人、补习科录取 6 人，及格率非常高；其余地区的考生则表现差距较大，其中如太平、仰光、坤甸都是全部落榜，而除了上举几个地方以外，其余考生即使录取也只分到补习科。¹¹⁸

此外，紧接着 3 月 19 日又公布关于“补考新生”的通知，给那些“前已报名未及应考者，或由远处新到，虽未报名极愿来学者”，“特定此二十六号上午八时在本校补考一次”。

根据 1922 年第一届毕业生的记录，这一批第一届学生入学一共 78 人，初始分作三班：普通科甲班 32 人、普通科乙班 21 人、补习班 25 人。普通科二班到了第二年再分为普通科 37 人、商业科 16 人。而 1922 年毕业时总数则仅为 27 人，其中普通科 15 人、商业科 12 人；尤其普通科的毕业率极低，所谓“未及当初人数之半”，可见学业要求颇高。这 27 人即校长涂开舆所称之“二十七子”。（南洋华侨中学 1922：15-36）

1919 年 3 月 21 日，南洋华侨中学举行开幕仪式并正式开课，拟定仪式下午一点开始，依序为：振铃开会、奏乐、乐歌、全体向国旗校旗行三鞠躬礼、全体向至圣像行一鞠躬礼、校长报告本校经过情形、领事训词、来宾训词、总理董事训词、教员训词、校长答词并训词、乐歌、奏乐。

¹¹⁹

具体在开幕当天，道南、养正二学校的乐队负责奏乐，接着是孙领事训词，其后是来宾郑螺生的演讲，再后到董事会总理陈嘉庚讲话时，“中间因雨，稍辍，嗣改往楼上讲演”；其间仪式顺序越过原定“校长报告本校经过情形”而由孙领事开头训词，估计乃因孙领事有要事在身。记录云：

先是孙领事以招待伍领事初到，杂事繁冗，因通函往校道歉，以示或弗能来之意。恰遇邱菽园君往会之便，顺途往约孙领事以必到，并言秩序单有刊及领事训词。在理在势，应该拨冗亲到也。孙君称是，乃让邱先行，随后即到矣。”¹²⁰

陈嘉庚的讲话提及三点“可为乐观者”，对于南洋华侨中学办校的意义归纳得最具代表性，其云：¹²¹

当提倡之前，企恐乏及格之生徒。兹者已达百人，爪哇尚未加入，檳城亦办中学，否则学生必至二百人以上。足见毕业生之多，求学之切，而中学之需要。此可为乐观者一也。

兹中学成立，若造一极光明之大镜，普照诸小学校成绩优劣，如人面镜姙妍悉辨，决不容有所私。……乐观者二也。

¹¹⁵ 1919. 3. 14-17《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挂号学生总录》。

¹¹⁶ 根据《南洋华侨中学校第一届毕业纪念册》记录，“前来受试者八十余人，录取七十有八”（南洋华侨中学 1922：23）。可见当年报章所载录取人数是准确的，更兼完整列出学生名录，所以受试总数 93 人应该是准确的，1922 年毕业册上所说的“前来受试者八十余人”显然是当时误记。

¹¹⁷ 名单中“龙历爵”未出现在此前的考生名单中。实则对照录取名单与考生名单有不少错误，录取名单中的“林树辉”，考生名单为“李树辉”，又录取名单之“刘怀谷”，考生名单为“刘怀才”。然而此处“龙历爵”实在是无法对上考生名单中的任何一人。

¹¹⁸ 1919. 3. 17《南洋华侨中学校第一次录取新生布告》。

¹¹⁹ 1919. 3. 21《南洋华侨中学开幕礼式》。

¹²⁰ 1919. 3. 22《中学之开幕》。

¹²¹ 1919. 3. 26《南洋华侨中学开校纪事（续）》。

昔旧习有省府之界，正非国家之福。兹中学校集各各省学生于一堂，则于言语上、感情上，定能互相融洽，相亲相爱，并可身体力行，感化大众，不分畛域，共发挥爱国热诚。此可为乐观者三。

仪式的最后则是涂开舆校长答词与训词，“如仪完毕，惟摄影一事，因雨故障，由林副总理说明改期”，最后又是道南、养正二学生乐队奏乐¹²²。

4月1日登报公布《南洋华侨中学校章程》、《校长任务规章》、《校董职务规章》。其中校董人选分配即按照此前2月18日会议之所决定；可注意者为“学校章程”中关于课程及招生的条例。首先，关于课程，其云：“本校除设普通科及补习科外，为毕业生不能升学而志愿从职业者，于第二年始酌设第二部农工商一科或数科，每科学额四十名为限，修业期四年。”¹²³这里所列“普通科”与“补习科”即招生时所分别招收的“正科”与“补习科”。而其中所谓“第二部农工商科”则属于专门科，即修完一年普通科之后可以通过考试报读。比如1920年初所刊布的招生广告云：“本校中学第二部普通功课第一年已修毕。兹定本年开教授商业科课程。凡修毕中学课程一年者，均可受试插班。”¹²⁴到了1922年则改为第二年修毕后才考试转入商业科。而根据1922年第一届毕业纪念册的记录，当时不论是普通科或者商业科都属于四年制；即当届商业科毕业者实则是普通科一年、商业科三年。（南洋华侨中学1922：15）

此外，《南洋华侨中学校章程》在招生考试规定上做了调整。首先，考试方式从原先考“国文、英文、算学”，另加设一场“口试及身体检查”；其次，考试录取原本分为及格者列“普通科”、不及格者列“补习科”，然而自“民国九年起非及格者不收”。

自从2月18日提议解散临时董事会，并制定正式董事会人员分配后，由于各方方言帮群推举人员迟迟未到位，以致拖延至4月份才成立正式校董。如其3月23日刊布一份《南洋华侨中学校催举正式校董》，云：

现查潮帮已由端蒙学校照章举报，余帮亟当按额续举用。特函请福建会馆、养正、启发、应新、育英诸学校，暨由商务印书分馆转致三江会馆，各照所定名额自行选举。准于本月二十七号以前函达敝处。

嗣后显然各帮都按时推举人选，唯独福建会馆却仍无法提交名额，甚且其于3月27日发通告云：“爰定本月二十九号下午三时，邀请乡诸君子到会公同选举十三名为中学之正式董事。”¹²⁵然而估计福建会馆3月29日的会议仍是未有结果，乃至3月31日始华侨中学连续发公告敲定4月4日成立正式校董，并票选各职务理事。其云：

迭经函请各校各帮催举正式校董以共分劳，乃一再展期，举数未齐，碍难发表。兹特专函再催，准定四月四号下午三时，邀请新旧各董事到会，办理交卸，当场票举正式副总理、财政、查账各职，共担义务。¹²⁶

于是1919年4月4日第一届南洋华侨中学正式校董宣告成立，由陈嘉庚担任正总理、吴胜鹏任副总理、林义顺为财政、何仲英与黄有渊出任查账，其余55人为普通董事，一共60人。¹²⁷第一届正式校董于4月21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并于会议上提出购置新校地，记录云：“当场议决公举正副总理陈嘉庚、吴胜鹏，财政林义顺、查账员何仲英、黄有渊，五人为购地专员。一经会勘，便可与之议价交付定银。”¹²⁸此番购置新校地最终选定：

¹²² 1919.3.22《中学之开幕》。

¹²³ 1919.4.1《南洋华侨中学校章程》。

¹²⁴ 1920.1.9《星嘉坡南洋华侨中学校招生广告》。

¹²⁵ 1919.3.28《福建会馆请举中学之校董》。

¹²⁶ 1919.3.31《南洋华侨中学临时校董定期交卸》。

¹²⁷ 1919.4.10《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职员表》。

¹²⁸ 1919.4.21《南洋华侨中学正式校董第一次议案》。

张振南君在武吉智马律一树乳园，面积七十一英亩，购价八万三千元。该园距坡五英里，起向路方面宽广平直，建筑校舍，最为适合。且火车来往叻坡、柔佛、麻六甲、吉隆、霹雳、檳城等处者，比过其门，距火车站不远，便于交通。一经建筑，何者为讲堂、何者为宿舍、何者为操场、何者为稼圃，任意设施，咸称所得。¹²⁹

这就是沿用至今的武吉知马路上的校址；一百年前校董们的精心策划、深谋远虑，确保了南洋华侨中学一百年来稳固地茁壮成长。

董事会购置新校地的急切就能直接看出，至此董事会对于中学的前景是万分乐观的；实则上述招生方式与录取制度上的严格化，就已十分清楚显示出董事会的这种信心。至此南洋华侨中学一应体制已基本完整，此后师生人员持续扩大，课程不断完善，尤其校舍设备等不断提升，校务蒸蒸日上。

（二）历次筹款与捐助

1918 年同德书报社召集一批 16 人的小学校董总理商讨组织筹办会，并拟定一份《实行筹办南洋华侨中学之通告》，其中分析历年来多次倡议筹办中学都以失败告终云“有二原因在焉”，其一就是“以巨大之经费难筹也”。

实则华人经济史的研究多已指出，第一世界大战期间主战场在欧洲，这时期“刺激了华侨经济的发展和繁荣”（郭梁 1994）。比如陈嘉庚《南侨回忆录》（1946）中也指出 1904-1914 年之间其资本积累平均每年 10 万元，然而一战爆发以后其每年平均积累的资本达到 90 万元。于是我们上文也提及当时多数人都认为只要华人资本家肯出钱，数十万办一所中学是不成问题的；比如陈嘉庚在筹办会的演说就提到：

若更谋伟大之建筑，则必购数英亩之地，营宿舍讲堂数十座，容生徒数百人或近千人，核其经费，当在二十万元以上。……似此区区，以内外各埠侨胞之踊跃捐输，实不难咄嗟之办。¹³⁰

即此可见，“巨大之经费难筹”固然是前此历次倡办中学的一大阻碍，但其难并非难在拿不出钱，而是不肯出钱；究其主因还是我们上文总结过的：一、对于办中学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缺乏认识；二、各方言帮之间缺乏合作办学的团结向心力。

无论如何，从我们根据历次整理的捐献中学款项金额计算，陈嘉庚最初定下的 20 万元目标，在中学开学之后短短的不到一个半月时间内就筹得了。具体来算，扣除掉中学筹办会最初筹集并已呈交的 16,000 元，从 1919 年 4 月 8 日至 1920 年 3 月 29 日的约一年时间里，中学的募捐共收得 35 次捐献，一共 356 笔捐款，金额总数为 675,762.31 元。¹³¹

我们依据《振南日报》1919 年 4 月至 1920 年 3 月份，由南洋华侨中学所发布的所有捐献资料，整理出以下这份完全列表：

表一：1919 年 4 月份至 1920 年 3 月份南洋华侨中学捐助人与金额列表¹³²

¹²⁹ 1919.5.24《南洋华侨中学正式校董第三次议案》。

¹³⁰ 1918.6.22《筹办南洋华侨中学大会议之情形（四续）》。

¹³¹ 这里的金额全为当年的叻币；以下列表均同。

¹³² 本列表依据《振南日报》1919 年 4 月 8 日至 1920 年 3 月 29 日所刊载之“南洋华侨中学校捐款”公告所整理。原刊载公告有混乱处，本列表即行修改处理。比如原公告中罗列捐款多数捐款均以叠加方式公告，如一人前加 100 已见前表，若嗣后追加 100 后其表中则相叠加而列 200，最后在核算总数时声明扣除，然而也有个别原公告罗列就指明“加捐”。本列表为示总数与各次捐款数相符，且切合每一笔捐款之具体捐献日期，不采用叠加法，而是列表记录中直接扣除其前之捐款数额。此外，其中商号名称混用“宝号”、“号”，本列表一律称“号”；除了第 27 次捐款之“六十二商号合作”一笔，其中杂用人名与商号，各别则仅列姓氏，因此其 62 单位与人士全照录原文。此外还有第 34 次原公告中重出一笔“志成公司五百元”，今列表亦一并去除。

捐款次数	日期	捐款笔数	捐款人及金额	各次捐款总额	合计总额 ¹³³
第 1 次	1919.4.8	21 笔	陈嘉庚 30000; 简英甫 20000; 林义顺 10000; 钟水泮 3000; 林金殿 2000; 吴胜鹏 1500; 石清岐 1500; 梁谷欣 1000; 黄有渊 1000; 陈延谦 1000; 刘登鼎 500; 洪士扶 500; 云茂悦 500; 甘清泗 500; 曾汝平 500; 蔡嘉种 500; 林隆江 500; 钟小亭 200; 陈东岭 200; 黄竹岩 200; 顾旭侯 100	75,200.00	
第 2 次	1919.4.25	8 笔	徐垂清 10000; 沈联芳 4000; 林志义 3000; 林文庆 2000; 黄金钟 2000; 恒?成号 2000; 林箕发 1000; 陈辉相 1000	25,000.00	
第 3 次	1919.4.26	4 笔	廖正兴 10000; 陈梦桃 10000; 蓝伟烈 5000; 吴克俭 2000	27,000.00	
第 4 次	1919.4.29	27 笔	邱国瓦 3000; 林得金 3000; 沈坤江 2000; 林得松 2000; 曾国办 2000; 元吉有限公司 1500; 蔡嘉钟 500; 林推迁 1000; 王金炼 1000; 杨福河 1000; 叶万隆号 1000; 陈谦福 1000; 蒋礼智 600; 黄仙舟 500; 欧景聪 500; 李俊秩 500; 吴继辇 500; 石焕章 300; 联裕号 300; 薛荣华 200; 李养赞 200; 陈翼伏、李凤岩、雷善甫、王会议、郑古悦、陈子麦, 各 100	24,200.00	158,400.00 ¹³⁴
第 5 次	1919.5.1	12 笔	通合号 5000; 吴祥和 3000; 吴再合号 2000; 万裕隆号 2000; 张顺养 2000; 吴再盛 1500; 黎润生 1500; 郭南盛号 1500; 元茂号 1500; 蔡荣顺号 1000; 杨隆发号 1000; 林春水 1000	23,000.00	
第 6 次	1919.5.2	9 笔	荣利号、荣丰号、荣业号 8000; 邱扬阵 4000; 张振南 3000; 薛永元号 2500; 陈若愚 2000; 郭南存 1700; 李俊承 1500; 李伟南 1000; 郭开升号 300	24,000.00	
第 7 次	1919.5.5	13 笔	沈蔼塘 2000; 陈敬堂 2000; 东兴号 2000; 成源号 1500; 永万	14,200.00	196,600.00

¹³³ 这里的多数统计数据，其原来刊登的捐款公告中都已提供，有些为本文补充统计。然而其公告之统计中也时有错误，比如第 13 次捐款中，其统计总金额为“三十四万二千二百八十八元八角七仙”（1919.5.21《南洋华侨中学校捐款十三续》），然而根据其前后金额统计的核对，其数据都少了一千元，实际总数应该是 343,288.87 元；另如捐款笔数的统计，第 28 次计算当次捐款为“八笔”，其实应为 9 笔（1919.10.31《南洋华侨中学校捐款廿八续》）。

¹³⁴ 原告自第 5 次捐款开始计算总金额，乃云：“合上四次除前已交外，实再捐银十五万八千四百元”，这里并未言明此前四次捐款记录中哪一些是已交的，但根据所提供的的数据计算，截至第五次捐款公告日期为止，已交捐款为 16000 元。

			隆号 1200; 蔡日升 1000; 联庆号 1000; 刘绵号 1000; 王文敏 500; 吴忠黎 500; 振源酒店 500; 福和隆号 500; 通和号 500		
第 8 次	1919.5.6	15 笔	黄奕住 50000; 益美号 2000; 福盛号 1500; 福裕号 1500; 两顺利号 1500; 四顺号 1200; 兴美号 1200; 南兴合记 1000; 万德丰号 1000; 昌隆号 1000; 吉成号 1000; 通益号 1000; 振庆发号 1000; 鼎盛美号 1000; 丘继显 500	66,400.00	263,000.00
第 9 次	1919.5.9	7 笔	联盛号 2000; 陈恒茂号 1500; 益和兴号 1000; 谢荣西 1000; 元隆号 500; 永南成号 500; 源号 500	7,000.00	270,000.00
第 10 次	1919.5.10	14 笔	元发栈 4000; 陈生利号 2000; 吴祥发 1500; 黄仙舟 1000; 蓝裕盛号 1000; 陈开国 1000; 义诚号 1000; 永万发号 1000; 两和公司 1000; 福顺隆号 1000; 万利丰号 1000; 利源号 1000; 成茂号 1000; 信孚公司 500	18,000.00	288,000.00
第 11 次	1919.5.13	18 笔	吉美号 3000; 戴春荣 2000; 恒利号 1000; 国风幻境剧社 1788.87; 嘉美号 1500; 谢有祥 1000; 合发号 1000; 成和号 1000; 振成发号 1000; 和美号 1000; 鼎盛盛号 1000; 南春号 500; 万丰号 1000; 华林公司 1000; 泉州公司 1000; 南华号 500; 苏妈英公司 500	20,788.87	308,788.87
第 12 次	1919.5.16	12 笔	振发兴号、振源兴号 1500; 王文达 1500; 王平福 1500; 协泰昌 1000; 长成栈 1000; 萧荣珍 500; 万顺号 500; 绵发号 500; 成兴号 500; 悦成号 500; 新荣成号 500; 张崇崧 500	10,000.00	318,788.87
第 13 次	1919.5.21	7 笔	林秉祥 15000; 颜克明 3000; 怡和栈、麦仲尧 2000; 傅清池 1500; 张顺善 500; 杨集茂号 1500; 汇通号 1000	25,500.00	343,288.87
第 14 次	1919.5.23	5 笔	源振号 3000; 合隆公司 2000; 林箕菊 2000; 盈丰号 2000; 日新公司 1000	10,000.00	353,288.87
第 15 次	1919.5.29	9 笔	陈惟贤 2000; 万裕兴号 1000; 成发号 1000; 德怀号 1000; 永生元号 500; 陈季驕 1000; 同新	9,000.00	362,288.87

			号 1000；陈益成 1000；炳利号 500		
第 16 次	1919.5.30	11 笔	沈振铭 2000；周如切 1000；茂兴公司 1000；瑞吉号 1000；永吉号 1000；瑞吉祥号 1000；和丰盛记 1000；公发号 1000；元成发 1000；新合吉号 1000；新开茂号 1000	12,000.00	374,288.87
第 17 次	1919.6.4	8 笔	黄有渊 1000；三来兴号、新兴号 2000；王水斗 1500；陈贱 1000；陈芳审 1000；梁永吉号 1000；荣发号 1000；蒋德九 500	9,000.00	383,288.87
第 18 次	1919.6.11	10 笔	吉昌号 1000；源德美号 1000；振成丰号 1000；大兴公司 1000；联源号 1000；殷雪村 500；吴士基 500；陈水蚌 500；永吉安号 500；锦丰号 500	7,500.00	390,788.87
第 19 次	1919.6.14	6 笔	方庆成 2000；万祥美号 1000；刘和美号 1000；周义德号 1000；郭淮清 1000；刘亨记 500	6,500.00	397,288.87
第 20 次	1919.6.18	6 笔	陈若愚 2000；吴胜鹏 1500；薛中华 1000；薛武院 2000；两成号 1000；甘菜头 500	8,000.00	405,288.87
第 21 次	1919.6.30	6 笔	张秀杰 2000；永万春号 1000；南丰隆 1000；王邦杰 1000；永元成号 1000；荣振源号 1000	7,000.00	412,288.87
第 22 次	1919.7.7	7 笔	陈生利号 2000；曹泰山 2000；黄审昌 1000；同利号 1000；林得财 1000；陈文荣 1000；承巨林火锯公司 1000	9,000.00	421,288.87
第 23 次	1919.7.14	9 笔	谢妈延 2000；张裕和号 1250；万安和号 1250；王昭琳 1200；陈开荣 1000；福兴隆号 1000；大光号 1000；瑞兴号 500；泰泉号 500	9,700.00	430,988.87
第 24 次	1919.7.22	1 笔	四益公司 2000	2,000.00	432,988.87
第 25 次	1919.7.26	7 笔	陈楚楠 2000；新松林火锯号、新发祥火锯号 1000；刘登鼎 500；黄光化 500；黄汉种 500；何经绪 20；王颺斌 11.13	4,531.13	437,520.00
第 26 次	1919.9.24	8 笔	李浚源 10000；锦南兴公司 1500；黄府赵夫人 1000；声源号 1000；万兴利号、叶祖意 5000；振美号 1000；盈丰号 500；施申律师 100	20,100.00	457,620.00
第 27 次	1919.10.21	20 笔	蔡婉娘代其先夫陈齐贤 10000；何顺养 3000；裕利公司 2000；德裕兴号 1000；卢礼朋 1000；李加顺 1000；钟癸添公司	37,450.00	495,070.00

			1000；杨万庆 1000；顺泉成栈 600；陈两成号 500；陈振哲 1500；怡盛隆号 1500；周关阶 1100；黄福盛祝记 1000；广福成号 1000；益泰安号 1000；罗四本堂 1000；群益号 500；林亚雨 500；协隆兴、源成兴、锦建昌、建丰源、源福兴、新恒发、新和成、金盛兴、德兴隆、万东和、振胜兴、金合德、四合兴、协建兴、新泰美、协隆成、春生堂、成源丰、同合利、福发公司、紫祥公司、建祥公司、万成祥记、万瑞福发记、春和、合成、恒兴、集茂、长兴、裕成、瑞隆、瑞成、建兴、万春、高源、源美、振和、建和、复兴、协昌、同丰、绵昌、杨著君、郑香君、郑已注、林拱顺、傅泰、沈麒麟、田君、仗兴君、傅芙蓉、傅添福、傅火炎、洪振乔、许文章、林盈君、松柏君、苏秉圃、苏文笔、蒋为才、林士玳、沈辉龙 7250		
第 28 次	1919. 10. 31	9 笔	黄木信 2000；王顺发号 2000；颜祥昌号 1000；李顺庆 1000；先施公司 1000；中华国货公司、互助公司 1000；陈振耀 1000；陈振堆 1000；陈振武 500	10,000.00	505,070.00
第 29 次	1919. 11. 8	13 笔	大同栈 2000；黄云辉 1500；吴生发号、陶然兴号、公合发号 1000；新南兴号 1000；泰成号 1000；吴康泰 1000；森美公司 1000、义发号 1000；美山公司 1000；建南公司 1000；商业公司 1000；陈振文 500；陈龙昌 500	13,500.00	518,570.00
第 30 次	1919. 11. 15	11 笔	龙道舜 5000；陈日进 1000；彭士震 1000；林金城 1000；张扶来 1000；邱瑞耀 500；潮昌号 500；裕德盛 500；纶彰号 500；万合丰号 500；裕盛隆号 500	12,000.00	530,570.00
第 31 次	1919. 12. 6	9 笔	吴晋升 3000；南漳公司 1500；王祈顺 1000；上海保险公司 1000；李隆昌号 1000；裕和号 1000；和成号、隆成号 1000；神农药房 500；陈发兴号 500	10,500.00	541,070.00
第 32 次	1919. 12. 10	6 笔	郭盛淮、郭盛河 5000；何仲英 500；金连城 1000；李五福号	8,600.00	549,670.00

			1000; 陈发兴号 1000; 翁玉峰 500		
第 33 次	1919. 12. 18	10 笔	华商银行 2000; 何乐如 1000; 华益兴号 700; 民兴药房 500; 郭聘廷 500; 杨岐山 500; 余来吉 500; 梁报丰 500; 陈龙发号 500; 志成公司 500	7, 200. 00	556, 870. 00
第 34 次	1919. 12. 24	7 笔	恒顺丰号、张顺助 1000; 协吉号、胡先情 1000; 天兴公司 1000; 允昌号 1000; 长兴公司、黄山珍 1000、万益合记 1000; 邱雁宝 1000	7, 500. 00	564, 370. 00
第 35 次	1920. 3. 29	11 笔	大总统奖劝学金 2692. 31; 黄仲涵 100000; 黄德成 2000; 四海通银行 2000; 谭庆云 1000; 福同源号 1000; 泉协发号 1000; 合盛号 500; 陈德隆号 500; 信隆号 500; 长丰隆号 200	111, 392. 31	675, 762. 31

上表中的第五次捐款公告中，其统计云：“合上四次，除已交外，实再捐银十五万八千四百元。”¹³⁵ 根据我们计算前五次捐款的总数应是 174, 400 元，而其记录为 158, 400 元；可见这个合计数目是扣除了 1919 年 5 月 1 日之前已实际提交了的总数 16, 000 元的捐款金额。因此将此数额算在内，至 1920 年 3 月底的所有捐款总数应为 691, 762. 31 元。

不论如何，为办中学而募来的这个捐款结果，极大增加了校董们的信心。从整体来看，当时社会对于中学的认同与资助情况实在是很鼓舞人心的；尤其表中不难看出所得捐助来自社会各阶层，而且其捐助来源极为广泛，并非是少数几位大富户的阔手一挥。其中固然多数为劝捐员之奔走募款，但也有很多是主动上门的，最突出即第 24 次、第 25 次的捐款。即 1919 年 7 月 14 日第 23 次捐款公告之后进入学校假期，劝捐人员休假，拟定 8 月 8 日再开始出外劝捐；而这期间仍有两次自己登门来的捐款，其云：“按本校劝捐员请假未滿，乃能募义向风者不劝自来，尤足倾佩。”

此外，还有上述列表之后的 1920 年 6 月槟城广府居剧团来新加坡演剧筹款，“所筹款项，以二份拨助礼佛大学堂，一份拨助本校经费，其热心教育，十分可敬。”¹³⁶ 可见当时整体社会支持与捐助南洋华侨中学的热情十分高涨。尤其当我们考虑到当时槟城华侨中学实际上仍还在运作，且是于隔年之 1921 年就因财政困难停办。

关于槟城华侨中学，1919 年 5 月份的南洋华侨中学第 21 次捐款报告中列有一条“国风幻境剧社由槟城捐二千七百八十八元八角七分”，并且说明是：“前年国风幻境由星洲抵屿演剧，筹款所得捐数并存银行利息，……现经开会议决，以半数留助槟城中学，以半数由汇丰银行寄助星洲中学。”¹³⁷ 可见两地对于办中学是相互支持的。

上述列单中还值得注意的是第 35 次捐款中的两笔捐款：一是“大总统奖劝兴学京币千元，伸叻银二千六百九十二元三角一仙”；二是“黄仲涵先生捐银十万元”¹³⁸。其中黄仲涵为印尼华人富豪，其捐款情况李卓辉（2019）已述之略详，其十万元巨款捐助对南洋华侨中学新置校地的修

¹³⁵ 1919. 5. 1 《南洋华侨中学校捐款五续》。

¹³⁶ 1920. 5. 20 《中学校议事记》。

¹³⁷ 1919. 5. 14 《南洋华侨中学校捐款十一续》。

¹³⁸ 1920. 3. 30 《南洋华侨中学校捐款卅五续》。

建贡献极大，于是中学乃议决：“黄仲涵大善长乐捐建校费十万元，议将正座讲堂大书‘黄仲涵’先生三名，并悬肖像以留纪念而遂瞻仰。”¹³⁹

这里值得补充的是，梁绍文《南洋旅行漫记》中曾指黄仲涵为“世界上最有钱的中国人”，并称其父亲因参加太平天国而最终难逃，其云：

黄仲涵福建人，在南洋不过两代，年数不过七八十年。生于爪哇的三宝壟，所以他是一个哇哇仔。他的父亲原来是一个洪秀全的余党，自从太平天国被曾国藩打翻了，各省次第剿捕余孽，他被官府搜捕甚急，家乡已不能住了，国内亦无容身之所了，于是‘逃之夭夭’。一逃就逃到了爪哇，从此就与中国绝缘了。在爪哇生儿育女，生意畅旺，手里创了数十万的家产。（梁绍文 1933：205）

至于“大总统”的捐款，公告当日即称：“谨按大总统为宗邦元首，喜吾侨之兴学，以奖以劝，特发京钞，由总长谕议，和全权大使办事处，函汇驻叻总领事，转付总商会议决移交本校收领，专为奖励毕业生之用。”¹⁴⁰ 此后 1920 年 4 月份乃议定：“大总统奖励兴学款项，议照总商会原议，条寄存银行生息，专备奖励毕业生之用，以志光荣而助后进。”¹⁴¹

当然，中学经费问题并非一直都是一帆风顺的，相反的大部分时间都相当紧缩。尤其在初始阶段的 4 月至 5 月间，至少董事会都极度不安且倍感压力。于是 4 月份董事会想到一个长久之计，即去函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恳请会长择期开会，提议商会进款，每月准拨一千五百元以助本校经费。”¹⁴² 饶是中学董事会半数以上都为总商会会员，但每月 1500 元的数目不小，且商会自身亦有财务困难；于是 5 月初回函云：“今以兴学所关，又不得不勉力筹措，爰经公决，按月酌拨五百圆。”¹⁴³

这算是初期很重要的定期收入，算是最初的一剂定心丸，极大增加了校董们的办学信心，虽不是原定的金额，但犹如久旱之甘露。

中学兴办初期的另外一项当务之急就是各笔认捐款项，仍得加紧收捐。于是 1919 年 6 月初就发公告“收捐之预约”，其云：“所望诸善长之已捐者，请具如数惠交。”¹⁴⁴ 而根据目前所见，各笔认捐者交款都非常积极，极大地缓解了中学运作与扩张，乃至购置新校地与建设新建筑等事项的发展。

据统计，截至 1920 年 4 月 14 日为止，一共收捐 24 次，总数 250 笔，总金额 426,842.31 元。今据各次收捐笔数及金额简略列表如下：

表二：1919 年 6 月份至 1920 年 4 月份南洋华侨中学收捐列表

收捐次数	日期	收捐笔数	各次收捐总额
第 1 次	1919.6.26	5 笔	13,000.00
第 2 次	1919.7.2	3 笔	7,000.00
第 3 次	1919.7.7	6 笔	14,000.00
第 4 次	1919.7.15	6 笔	12,000.00
第 5 次	1919.7.25	4 笔	10,500.00
第 6 次	1919.7.30	10 笔	19,900.00
第 7 次	1919.8.4	8 笔	10,500.00
第 8 次	1919.8.8	8 笔	12,500.00

¹³⁹ 1920.4.7《南洋华侨中学校议案宣布》。
¹⁴⁰ 1920.3.30《南洋华侨中学校捐款卅五续》。
¹⁴¹ 1920.4.7《南洋华侨中学校议案宣布》。
¹⁴² 1919.4.26《中校董事函》。
¹⁴³ 1919.5.8《总商会复南洋华侨中学校董公函》。
¹⁴⁴ 1919.6.9《南洋华侨中学收捐之预约》。

第 9 次	1919. 8. 14	20 笔	21, 500. 00
第 10 次	1919. 8. 20	18 笔	20, 000. 00
第 11 次	1919. 8. 25	9 笔	11, 500. 00
第 12 次	1919. 8. 30	8 笔	10, 000. 00
第 13 次	1919. 9. 4	11 笔	9, 800. 00
第 14 次	1919. 9. 12	11 笔	9, 000. 00
第 15 次	1919. 9. 22	11 笔	8, 600. 00
第 16 次	1919. 9. 26	10 笔	20, 500. 00
第 17 次	1919. 10. 30	15 笔	40, 250. 00
第 18 次	1919. 11. 13	12 笔	25, 500. 00
第 19 次	1919. 12. 1	11 笔	11, 100. 00
第 20 次	1919. 12. 26	13 笔	16, 200. 00
第 21 次	1920. 1. 26	14 笔	13, 300. 00
第 22 次	1920. 2. 13	14 笔	10, 000. 00
第 23 次	1920. 3. 9	10 笔	10, 100. 00
第 24 次	1920. 4. 14	13 笔	14, 092. 00

三、结语

南洋华侨中学创建于 1919 年，是南洋华文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其历史关键性则必将之置于海外华文教育史的视野中才愈加显著。比如根据 1917 年底中国教育部所登录的资料显示，包含“英属南洋各岛、荷属南洋各岛、日本、朝鲜、美国、美属南洋各岛、英属澳洲、英属缅甸、法属越南、英属加拿大”等世界各地的华文学校，其中仅“有中学一校”，以及“高初小学附设中学班者一校”¹⁴⁵。

而在此后一年余的 1919 年 3 月份，南洋华人就分别创设了“槟城华侨中学”与“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二所中学。这不得不说是南洋华人在世界华文教育史上的“丰功伟绩”。

南洋华侨中学是全体南洋华人经过多年多番前仆后继地共同耕耘而最终收获的历史果实；其最终得于 1919 年收成乃由历史必然与偶然条件之无缝契合所致，即客观条件上：一、1917 年始标志着高等小学毕业生急速增加，包括此前已毕业之人数，中学的生源得以保障；二、通过 1913 年以来前后多人倡议与策划的努力之下，办中学的意识及其建设上的诸多细节都已经过反复思考与讨论；三、1914 年欧洲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南洋华人的整体经济实力得以大幅度提升，极大程度解决了办学的资金问题；四、中国学界与政府的附和与支持，包括认同办中学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以及政府提出的资助，一定程度坚定了办中学的信心与意志；五、民初以来强调办学统一化与规范化，以及破除方言帮派畛域的合力办学，尤其是学务总会的组织与活动形式，虽其未属成功典范，但毕竟提供了一个合力办学的初始平台。

因此当 1917 年陈嘉庚为代表的第三度倡办中学，这些客观条件都已齐备，唯独“只欠东风”；而这个偶然条件，就是 1918 年同德书报社协同国风幻境剧社遍历马来半岛九个城镇演剧筹款，带回新加坡一万七千元的办学捐助。这笔金额实在是微不足道，但却表达了当时最为广泛的一次共同创办中学的普遍意愿，于是经与陈嘉庚等人协商，召集新加坡 16 所学校总理联合拟定联署一份《实行筹办南洋华侨中学之通告》。

这一系列进程铺展开来即成一幅南洋华人苦心经营教育与文化事业而接棒式合力共进的历史长轴。这绝非仅仅是一所中学的创立，它实则是南洋华文教育史的一座丰碑：一、它标志着南洋华人办学历史上打破方言帮派畛域的一杆重要旗帜；二、它标志着南洋华人基础教育学制与升阶上的完善化；三、它标志着南洋华文学校教学与管理上的质量提升以及统一化与规范化。

¹⁴⁵ 1917. 11. 9《侨学成立之校数》。

当中第一点尤其关键，它不仅是各方方言帮群合力办学的成功典范，更是南洋华文学校舍弃方言而朝向“国语”教学的重要里程碑。

叶钟铃（1992）在叙述这一段历史进程时，所云“概念的产生、演进与实现”是非常准确地把握了这段历史发展的实质；且其视野之开阔也抓准了创建南洋华侨中学的历史定位与意义。

《百年华中情》（寒川主编 2019）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一百年历史的梳理上前轻后重，纵是退而求次乃不诉诸于史学范式之要求，但若使创建中学之历史格局卷缩于一人一地之小圈内，则难保几成历史负罪。

一百年前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的创设历史绝不仅仅是“陈嘉庚”一人或者“新加坡”一地；这就是开头引言所谓叶钟铃（1992）“不论是史料的掌握或是史实的洞见，当然更包括历史叙述的视野与格局”都远高于《百年华中情》（寒川主编 2019）的关键。叶钟铃（1992）很完整地介绍了1918年以前的几次倡议中学活动，然其分别论述、割裂其事，虽然文中明言“前仆后继地推动”，但由于缺乏对各次倡议活动中的细致辨析，因此未能将其穿针引线以织成一幅“倡办中学运动”的历史长轴。当然，也正是由于缺乏针对各次倡议活动及其倡议人拨丝抽茧地解析，因此出现某些细节上的失准在所难免。

本文通过百多年前南洋华人倡办中学前仆后继的一系列运动，包括当中经历的事态兴衰以及人事浮沉，进行了尽可能详实地叙述；其目的是要还原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的真实历史定位与意义：这是一所坐落于“新加坡”的全体“南洋华侨”前仆后继合力创建的“中学”。

最低限度，本文叙述一百多年前的这一段历史发展进程，适足以补充此前叶钟铃（1992）与《百年华中情》（寒川主编 2019）在对这一百年历史叙述上的某些空缺；尤其是1918年成立筹办会以至1919年3月份开学的一系列事态发展以及董事会议情况，乃至最初的筹款活动以及社会各界的捐助人与金额，本文应属于第一次系统整理与论述。

参考文献：

- 檳城新報 1914a。《領事通告》。《檳城新報》1月8日。
- 檳城新報 1914b。《熊視學與戴領事之關心學務》。《檳城新報》6月5日。
- 檳城新報 1919。《中學之校長已至》。《檳城新報》2月14日。
- 陳安仁等 1920。《教育總會評議長及評議員退職通告書》。《振南日報》9月8日。
- 陳嘉庚 1946。《南僑回憶錄》。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印刷社印行。
- 郭梁 1994。《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東南亞華人移民與經濟》。《八桂僑史》第1期，P21-28。
- 何悟凡 1917。《維持南洋英屬華僑教育總會商榷書》。《振南日報》11月2日-12月6日。
- 胡惟賢 1914a。《南洋英屬華僑學務總會開幕演說辭》。《振南日報》2月25日。
- 胡惟賢 1914b。《胡總領事上教育部文》。《振南日報》8月24日。
- 胡惟賢 1914c。《補錄胡領事在吉隆坡商會演說》。《振南日報》9月8日。
- 胡惟賢 1916。《胡總領事歡迎章太炎先生詞》。《振南日報》10月4日。
- 寒川主編 2019。《百年華中情》。新加坡：華中董事部、華中校友會。
- 黃偉曼 2019。《華中慶百年，總理吁本地學府鞏固多元文化國家身份》。《聯合早報》3月22日。
- 黃賢強 2007。《客家領袖與檳城的社会文化》。周雪香主編《多学科视野中的客家文化》P216-231，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
- 黃炎培 1917[2015]。《南洋華僑教育商榷書》。載《黃炎培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黃炎培 1918。《暨南學校規復宣言並招生啟》。《振南日報》2月2日。
- 藍偉烈 1917。《藍君偉烈為籌辦中學校事敬告僑胞書》。《振南日報》4月12日。

- 李秉嵩 2019。《二战前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对华侨中学的贡献》。寒川主编《百年华中情》P87-94，新加坡：华中董事部、华中校友会。
- 李叔飞 2013。《民国领事戴叔原与檳城华人社会》，载《马来西亚著名评论家谢诗坚的‘飞扬网络’》网站，http://seekiancheah.blogspot.com/2009/05/blog-post_8871.html。
- 黎运栋整理 2019。《华中倡办人陈嘉庚》。寒川主编《百年华中情》P174-181，新加坡：华中董事部、华中校友会。
- 李卓辉 2019。《黄仲涵财团对新加坡教育事业的贡献——从捐款 10 万建筑华中大礼堂谈起》。寒川主编《百年华中情》P190-194，新加坡：华中董事部、华中校友会。
- 梁绍文 1933。《南洋旅行漫记》。上海：中华书局。
- 南洋华侨中学 1922。《南洋华侨中学校第一届毕业纪念册》。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
- 旁观者 1914。《告学务总会诸君》。《振南日报》2月26日。
- 少界 1917。《论筹办中学校应以节俭为正义及立法须久远着想勿使流弊》。《振南日报》4月23日。
- 宋木林 1915。《养正学校宋校长来书照录》。《振南日报》10月14-15日。
- 熊长卿 1917。《祖国政府对于侨学》。《振南日报》11月14日。
- 熊杰、夏泉 2010。《试论民国初期华侨商科教育的创办与发展（1917-1927）——以暨南学校为中心的考察》。《侨务工作研究》第3期，<http://qwgzyj.gqb.gov.cn/154/1634.shtml>。
- 许德发 2015。《国粹教育与域外流寓者——论章太炎在马来亚的演说》。《汉语言文学研究》第4期，P33-47。
- 颜清煌 2017。《海外华人世界：族群、人物与政治》。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 杨绍强 2019。《波澜起伏在山岗——华中 100 纪要》。寒川主编《百年华中情》P20-73，新加坡：华中董事部、华中校友会。
- 姚绍璜 1915。《补录姚绍璜先生来信》。《振南日报》10月22日。
- 叶钟铃 1992。《南洋华侨中学的创设：概念的产生、演进与实现》。《亚洲文化》第16期，P125-136，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 叶钟铃 1993。《檳城华侨中学校史》。《中教学报》第19期，P65-76，新加坡：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暨职工会。
- 一郎 1920a。《教育总会演戏耶》。《振南日报》4月24日。
- 一郎 1920b。《呜呼教育总会》。《振南日报》5月29日。
- 友生 1920。《南洋工商补习学校之乐观》。《振南日报》9月30。
- 职民 1920。《对于南洋教育界意见书》。《振南日报》9月9日。